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佩賢 博士

日治時期臺北市的升學樣貌—  
以臺籍子弟入學中等教育機構為中心  
(1919-1945)

研究生：連玉如 撰

2013年8月

## 摘要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日治時期，自 1919 年學制確立後，臺籍學童有哪些升學管道？其中臺北市的升學樣貌為何？教育特色為何？又臺籍子弟完成初等教育後選擇島內「升學」的動機為何？其中是否有性別差異？或受到家族戰略、學歷主義等因素影響？並且在殖民政府對於臺灣本島人中等教育採取限制主義的背景下，加以臺籍初等教育畢業生的逐漸增加，至 1930 年代，中等教育機構嚴重不足，引起民間日臺籍人士的設校擴校運動，來自於民間的中等教育擴張運動，究竟為哪些人士參與？他們為何參與？又是如何運作，使設校遷校運動得以成功？最後，筆者嘗試解釋「升學」競爭及民間中等教育擴張運動蘊涵的意義，試著定位此等現象。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引進近代教育並大力推動，新進教育的引進對於以儒學為主的臺灣漢人自是產生衝擊，本島人對於中等教育機構的訴求最早為 1915 年臺中一中的設立請願運動，為臺人自發地要求設立中等教育機關的先聲。臺北市作為政治、經濟與文教中心，臺籍市民對於近代教育的需求顯著地高，反應於初等教育機構密度及就學學童比率居本島之冠。1919 年學制確立後，殖民政府開始設立更多中等教育機關，自 1919 年開始，市內臺籍子弟除留學外，也可選擇島內升學的管道；再從統計數據得知，歷年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等臺籍學生報考者皆多於錄取者，其中以臺籍學生為主的臺北第二中學、臺北第三高等學校、臺北第一工業學校以及臺北市內私立中學校，報名升學考試學生漸漸增加，錄取名額卻幾乎沒有增長，逐漸形成「入學難」、「試驗煉獄」的升學競爭現象。

臺籍學童初等教育畢業後，選擇島內升學，可從兩個面相去探討：家族戰略、學歷主義，其中對於不同性別學童，學歷的意義也不同。男子升學多為個人出路，家族前途，例如謀求好工作或取得晉升社會領導階層的門票；女子則憑藉漂亮的學歷，獲得好歸宿。而在 1930 年代由民間人士發起的私立臺北國民中學校設校案，以及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遷校擴校運動，兩次運動的成功，新中間層貢獻良多。最後，筆者依據諸多升學者的選擇動機與民間的中等教育擴張訴求，推論「升學」的背後，其實隱含了傳統「讀書—考科舉—得功名—社會地位」的晉升模式思維。對於新政權所制定的新規則，即近代教育成為新的篩選機制，臺人相當機敏的接受，並且面對中等教育資源的限縮，集結起來要求更多的教育資源。

關鍵字 升學 區域教育 中等教育 家族戰略 學歷主義 新中間層

## Abstract

The thesis is about the reason and motive children who finished elementary school apply for higher school in Taiwan after 1919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chool system. What kind of the schools did they choose to enter? What's the image of students trying to enter secondary school in Taipei? What's the feature of education in Taipei? Moreover, what caused them to choose? Did they affect by gender, family or diploma?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s policy is to limited Taiwanese people entering higher school. However, Taiwanes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more and more but the secondary schools were poor a few. In this background, local people asked for m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ople in Taipei started high school expanding movement. What kind of these people did they support the movement? Why did they attend the movement? How did they make the goal? Finally,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entering higher school competition and high school expanding movement from local people, then make conclusion.

In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government brought modern education and spread it. It went crush to Taiwanese Han people because they studied Confucian for imperial service examination. However, Taiwanese Han people asked for Taiwanese own secondary school on 1915. They submitted the petition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aichung first high school and it worked. As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aipei region had a high dens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school enrollment was correspondingly high as well. Since 1919,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chool system and also built more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then, citizens' children could jo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by test in Taiwan except went abroad for studying. By statistic, the applications for high school, girl's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were much more than admission quotas. There were terribly competitive tests at Taiwanese secondary school especially at Taipei Second High School, Taipei Third Girl's High School, Taipei First Industrial School and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 applications became more and more every year while the admission quotas increased few. It caused difficulty for test and misery life for preparing test.

Why did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 hard for secondary school test? The reasons are two: one is family strategy, another is credentialism. Gender is also influence. For

example, male students joined test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or keep the family status ; female students for their marriage. Men studied hard for better job or become social elite one day. Women who get girl's high school credential will marriage well. Why could Taipei Citizen Private High School be established and Taipei Third Girl's High School be moved and expanded? I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new middle clas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who passed the tests) their autobiography or memoir and the request of secondary school expanding movement, it inferred thinking way of traditional promotion: "Study many years-Pass the imperial service examination-Get the scholarly honor-Given job in government and get wealth and reputation."

Taiwanese people were clever to accept new rule made by new authorities. To the authorities, modern education is the screening router; however to the colonial people, they thought it was the new chance to promote or keep their status. Even thought, the high school quotas were limited, children struggle to pass the test and become a high school student, and their parents got together and claimed for more education resources.

Key words : entering higher school/local education/secondary education/family strategy/credentialism/new middle class

## 謝誌

四年的研究生涯，真的要感謝師長及諸多人。

研究所生涯雖說最終目的是要「創造知識」，然而除了這本論文外，我其實得到了更多。說實話，我一直是個相當自我的人，且我並不是準備好了做了相當覺悟才來念研究所，可以說只是隨波逐流。每當我的指導教授許佩賢老師說到寫論文要「莫忘初衷」，我常常腦中一片空白，真是相當慚愧，我的初衷一點也不真誠甚至相當功利，另一方面，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態度相當鬆散，可以說沒有身為研究生的自覺。我能夠完成這本論文，是因為佩賢老師的諄諄督促以及家人朋友同學們的默默關懷支持。

首先我想感謝我的家人，儘管他們並不瞭解研究生到底在幹麻，但他們其實是最支持我的人，不論是經濟上的支持或是偶爾關心我的論文進度，爸媽總是基於愛，希望我一切順利，期間我一度很想放棄，曾向我親愛的家人坦白我覺得我做不到，想要休學，很感謝他們的包容與理解，在我相當挫敗的時候，他們給予我最大的支持；又再我決定要繼續完成論文後，因為時間相當緊湊，他們盡可能的協助我。

我很感謝佩賢老師在我研究所期間給予我的諸多建議，雖然我常不得要領，沒有做好，對於我這樣一個學生，老師對我還是很有耐心。也因為老師深知我的缺點，很深刻的分析並希望我不要逃避，我才能夠完成這本論文。

我也很謝謝學弟俊昌，今年一月時我曾對於自己要寫的主題沒有信心，他的一句「我認為你的東西不是不能寫，而是你應該好好分析你的史料」點醒了我，也因為他的這句話我那時沒有放棄，並在分析史料後，得以構思出目前論文的初步架構。

此外，研究所期間修所上張素玢老師，蔡錦堂老師的課。老師們做學問的方式與態度，都深深影響著我，寫論文期間，他們偶爾的關心提點，也給予我不同面相的想法與啟發。

也謝謝臺史所的小美、阿lan、佳卉、芷盈、煒翰、岡部先生、維正、維倫助教諸位的照顧，也很懷念與佳陽、育薇、宜君、威潭、怡璇、嘉吟、詩涵、郁雯、准一、浩鎮過去一同修課與導生聚時光，與學弟妹若菜、知臨、冠美、咏恩、俊昌、丰中、岡崎的討論與勉勵。中研院的明如、馨嬋、珮蓉、鎧揚給予我論文意見並支持打氣。還有諸多在研究生涯中幫助過我的學弟妹或學長姐，真的，要謝的人太多了。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3
第三節 史料與章節架構.....	6
第二章 臺北市的初、中等教育發展與升學管道.....	9
第一節 初等教育機關.....	9
第二節 中等教育機關.....	15
第三章 初等教育畢業者的選擇 .....	29
第一節 公學校畢業生的出路.....	29
第二節 升學的決定.....	39
第四章 民間的中等教育擴張訴求.....	49
第一節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校」設立運動 .....	49
第二節 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遷校擴校運動 .....	58
第五章 結論.....	68
附錄.....	70
參考書目 .....	72

# 表次

表 2-1 日治時期全島與臺北市學齡兒童就學率（本島人） .....	11
表 2-2 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本島人學齡兒童(1931-1941) .....	12
表 2-3 本島人於臺灣各市立公學校入學者 .....	12
表 2-4 公學校畢業後入學公學校高等科人數(1931~1941) .....	15
表 2-5 台北市中等學校入學者數（1922~1941） .....	16
表 2-6 台北市中等學校志願者數（1922~1941） .....	17
表 2-7 台北市實業學校志願者數及入學者數（1922~1941） .....	20
表 2-8 臺北市實業補習學校入學志願者及許可數 .....	23
表 2-9 私立中學校入學許可數(1931~1941) .....	26
表 2-10 私立中學校志願者及入學許可數者變化(1931~1941) .....	27
表 3-1 公學校學生推估畢業率（本科） .....	30
表 3-2 公學校本科畢業後狀況(男).....	31
表 3-3 公學校本科畢業後狀況(女).....	32
表 3-4 公學校畢業生主要升學管道所佔比率 .....	33
表 3-5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入學前學歷.....	34
表 3-6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出身地方 .....	36

表 3-7 臺北州立第三女學生（一年級）出身地方 .....	36
表 3-8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家長職業分布.....	37
表 3-9 臺北州立第三高女學生（一年級）家長職業分布 .....	38
表 3-10 臺北州立第三高女學生（一年級）本島人家長資產 .....	38
表 3-11 臺籍男學生學級概況分析表 .....	43
表 3-12 臺籍女學生學級概況分析表 .....	46
表 4-1 緩和入學難運動參與人士（1934 年） .....	52
表 4-2 私立國民中學學生數 .....	55
表 4-3 第三中學報考者數、入學者數 .....	57
表 4-4 三高女遷校陳情實行委員（1934 年） .....	62
表 4-5 第三高女入學志願者、入學者數 .....	65
表 4-6 家政女學校入學志願者及許可數 .....	6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

「台灣人向學心已勃興，如今無論任何人，起碼公學校若不畢業，均覺得臉上無光，更進而欲必須升學才行，均有此想法。」<sup>1</sup>

1931年田中一二於其著作《臺北市史》中如此描述台北地區的教育狀況，這段文字指出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即必須「升學」這樣想法的定著。

同時期1930年進入埔里公學校就讀的劉枝萬，於其訪談錄中如此描述埔里地區的教育狀況：當時學童的就學年齡依照規定是八歲，但十來歲才入學者所見多有，然不論如何，能夠入學受教便算幸運。蓋當時社會人民生活普遍窮困，許多家庭甚至不讓孩子讀書，寧讓他們留家分擔家務。以埔里為例，「街仔(街鎮)孩子的就學情況比「莊腳」(農村)來得積極。<sup>2</sup>

1930年代，不同地域的臺灣，臺籍兒童的就學情形差異甚大，臺北地區的學童除普遍就學外，更關注於「升學」的問題，埔里地區的學童卻是能夠進入公學校便算幸運。

再從初等教育就學率來看，1931年臺北市的平均就學率為61.42%，全島要達到這樣的就學率，已是1940年統治末期，1940年臺北市的學童就學率達到82.16%。<sup>3</sup> 可以說臺北市本島人就學率長期遠高於平均值，對照田中一二對於臺北市教育現象的描述，至少驗證了1930年代臺北市本島人學童「起碼公學校畢業」的狀況。此時的學童畢業後將面臨是否升學的抉擇，中等學校入學需經過考試，由於報名者眾，小公學校畢業生中志願升學者，往往經歷激烈的「試驗地獄」，多數無法升學者承受著落榜的痛苦。臺灣日日新報上更可見批判升學所帶來的不健全發展。為此臺北地區的家長屢次要求增班、增設學校，發起緩和入學難運動，甚至請願設校。

日本中學校史研究者米田俊彥指出，都市的中學校因為有商人（新中間層）的支持，得以穩固發展，且較能發揮其教育機能，即都市的中學校有許多的入學

<sup>1</sup> 田中一二著，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261。

<sup>2</sup> 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8年），頁24-25。

<sup>3</sup> 《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0年

志願者，半途退學者相對的少，希望入學上級學校者也多。相較於都市，農村的中學校較多輟學者，且上級學校進學者很少。<sup>4</sup> 米田的研究結果是否也可驗證於殖民地臺北？究竟臺北這個地區的教育狀況為何？能夠造就初等教育的穩定發展，並且民眾自發性地請願要求官方增班設校？

1920 年後臺北設市，歷經清代與日治前期的發展，臺北市逐漸形成全島行政、商業、及社會各項機能的重心，也成為台北州等區域內人口聚集中心。人口結構上，臺北市仍以台灣人為多數，但以區域發展特色而言，日人在臺北市聚集比例高達日人總人口的六成以上。職業形態方面，臺北市以官公吏、商業、工業以及雜業為主要職業內容，其中臺人主要從事商業與雜業，至於日人的職業集中於官公吏。商業與雜業，為臺北市職業型態發展上的特點。<sup>5</sup>

對市街庄來說，能夠增設班級或校舍，很大原因是各州能夠補助經費。<sup>6</sup> 臺北市財政固定支出，可分為教育、土木、衛生，以及役所(市政)等為主要支出項目。教育方面的支出，平均佔臺北市固定支出經費的 15.74%，其中小公學校費用更是教育支出的主要對象，平均可達 87.41%。可以說為因應初等教育就學人口的增長，小公學校費用持續攀升。教育事業的發展其實一直是臺灣地方團體，特別是都市財政的主要支出對象，在臺北市亦是市民關注焦點，為回應市民對於教育事業的懇切期待，臺北市當局除編列經常教育費用外，亦以臨時支出方式大量投注小公學校營繕經費，自昭和 11 年（1936）至昭和 15 年（1940）間，每年至少投入 17 萬圓以上，平均可佔臺北市臨時支出費用 11.2%。<sup>7</sup> 從人口、職業結構可知臺北市的區域特色，從教育財政的支持，可知臺北市初等教育穩定成長的基礎。

本文所要探討的「升學」概念，究竟是何時才出現呢？筆者認為應先從制度法規層面來釐清。從學制來看 1919 年教育令的頒布確立了初等教育後的升學機關，其後中等教育機關不斷增加，<sup>8</sup> 隨著升學機關的出現，初等教育畢業生開始

---

<sup>4</sup> 米田俊彥，《近代日本中 校制度 確立—法制 教育機能 支持機盤 形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17、139、140。

<sup>5</sup> 賴文清，〈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175。

<sup>6</sup> 李鎧揚，〈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本論文已出版為《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臺北市：國史館，2012），頁 163。

<sup>7</sup> 賴文清，〈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頁 248~249。

<sup>8</sup> 1919 年頒布的「臺灣教育令」整備了台灣人學校系統，至 1943 年實施義務教育，這期間中等

選擇是否升學，若要升學，便要思考升學哪類中等學校？準備升學考試。因此要觀察升學的情形，要先掌握 1920 年後臺北地區的初等、中等教育的學校數、就學學童數等教育狀況，故筆者將時間斷限始於 1919 年學制確立，至 1945 年終戰結束，不過礙於資料因素，筆者所能蒐集並引用的統計資料實際上只到 1941 年。

學校就學人數的增加，顯示了台灣人對教育希求的增強，臺北地區於 1930 年出現必須「升學」這樣的想法。然而殖民政府對於中等教育一直採取限制主義，加上 1922 年共學制後，臺籍學生在升學中等學校需與日籍學生競爭，臺籍學生就學名額實際上更少。<sup>9</sup> 在此背景下，1930 年代臺北地區民眾將如何面對？筆者試圖驗證，由於家長或學童對於升學的需求，自主地向官方爭取教育資源的過程。

從過去的史料搜尋，筆者發現 1930 年代臺北地區的升學熱與入學難現象；加以田中一二描述臺北市必須升學想法的定著，皆引起筆者的興趣。究竟初等後教育的進學機關是如何發展？當臺北地區的初等教育體系愈趨完善，學童選擇「升學」的因素為何？又是怎樣的背景得以升學。由於就學名額嚴重不足的問題導致民眾請願設校、遷校擴校，這樣的過程是哪些背景的民眾奔走出力，又這些日台籍家長如何聯繫、如何集結並爭取？筆者除釐清此時期臺籍學生選擇升學的因素，並試圖建構民間社會對教育的自發力量，從學級增設、校舍增築與各式學校的設立，探討官方（中央或地方）與民間的互動。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為更加釐清上述問題，本文將從以下三個脈落去思考。

### 1. 臺北史、區域教育史

關於日治時期台北地區的研究相當多，其關注焦點為都市發展與近代化關係，例如：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sup>10</sup>，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sup>11</sup>，賴文清〈邁向現代化一日

---

以上學校數不斷增加。1944 年計有實業補習學校九十所、實業學校二十七所、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各二十二所。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台灣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207-212。

<sup>9</sup> E.Patricia Tsurumi，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頁 81~84。

<sup>10</sup>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sup>11</sup>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sup>12</sup>。溫振華的研究探討殖民統治下台北由傳統三市街轉化成近代城市的過程，及其所產生的社會變遷，他的結論之一為，臺北的都市化程度為臺灣最高，由於臺北的都市化，高等教育機構設立。較多的高等教育機構培育新興知識份子擁有聯絡的場所，加以交通、電訊體系的建立，各種思潮由此傳回台灣，臺北成為政治活動中心，並指出日治時期的臺北為一日台人分離的二元都市。蘇碩斌從空間的概念出發，提出在日本政府的權力統治介入下，臺北由前近代的「地方社會」轉化為近代的「都市空間」，透過都市空間的建構，國家對於地方的控制力更為細緻且深入。賴文清則是從市政管理體系的建立，驗證臺北現代化的發展與變遷，相當詳細地介紹市政體系的運作過程。

區域教育史的相關研究有陳思琪〈日據時期台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sup>13</sup>，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1895-1945）〉，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陳思琪〈日據時期台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利用日治時期臺北各小公學校檔案，以及耆老口試訪談，試圖建立一臺北地區初等教育發展實況，雖掌握相當多資料，但在立論上依舊不脫殖民奴化教育框架，未更深入分析。然其論文指出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初等教育不論在學校設立密度，或學童就學率，皆相當高。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1895-1945）〉<sup>14</sup> 利用宜蘭縣各學校日治時期舊檔案，探討該縣初等教育發展概況，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sup>15</sup> 雖為國小校史研究，但作者利用諸多學校檔案分析，補足教育政策下的學校實況，建構出學校在地域社會發展的過程。

從台北史的研究可知，日治時期臺北已都市化，其都市特點之一為日台人分離的二元都市，在教育發展上，中高等教育機關相對集中於臺北市。從區域教育史研究，可知臺北地區教育特色為小公學校設立密度高，且學童就學率高。

---

<sup>12</sup> 賴文清，〈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13</sup>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sup>14</sup> 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1895-1945）〉（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sup>15</sup>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2. 中等教育史

至於中等教育史或個別學校史相關研究有：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方針、制度、背後支柱〉<sup>16</sup>，山本禮子〈植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sup>17</sup>，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sup>18</sup>，朱珮琪〈日治時期精英教育的搖籃—以臺中一中為例〉<sup>19</sup>，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sup>20</sup>。

個別學校史分別從學校創立經緯沿革、師生與教學、畢業生動向分析，指出個別學校培育出地方人才乃至社會「菁英」或「社會領導階層」。例如，謝明如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提到國語學校雖僅是中等教育，但在 1919 年以前已是難得的學歷，畢業生憑此學歷與良好的家世背景、優異的日語能力，成為新領導階層，延續家族的社會領導力。

中等學校的研究有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方針、制度、背後支柱〉，藤井究明日治時期中等教育制度的演變，中學校的設立與發展。根據藤井的研究，她提出就讀中學校的學生及家長為中學校形成的背後支柱，從 41 名日籍中學生與 47 名臺籍中學生的問卷資料，分析家長的學歷、職業，以及學童升學的原因，試圖建構出背後支柱的樣貌。本文將延續藤井「背後支柱」的概念，進一步提問，1919 年後臺北地區民眾對於中等學歷的觀感為何？他們為何選擇升學，如何選擇升學哪一類的中等學校？其中是否有性別的差異呢？

## 3. 學校與地方社會視角

最後，筆者想從學校與地方社會視角探討。最早從學校與地方社會切入者為許佩賢，其博論〈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sup>21</sup>透過「學校內部」的探討，考察作為國家裝置的學校在臺灣社會

<sup>16</sup> 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方針、制度、背後支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sup>17</sup> 山本禮子，《植民地台灣高等女學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

<sup>18</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sup>19</sup> 朱珮琪，〈日治時期精英教育的搖籃—以臺中一中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sup>20</sup>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臺師大，2012）

<sup>21</sup> 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定著之過程和特色。其著作《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sup>22</sup>延續此論點，第一部探討「學校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以國語傳習所的成立與運作，考察「近代學校」對於臺灣民眾的意義；再以〈近代學校的創設與地方社會—公學校的經費問題〉，探討近代學校成立之初，學校如何籌措財源。為確保財源穩定，總督府設計出「協議費」制度。而〈近代學校的發軔與地方社會—新竹地區的例子〉一文中，再討論學務委員的角色，官方利用學務委員這樣的名譽職，向民眾徵收「協議費」。在教育史研究上，許佩賢提出了另一新視角，從學校設置的過程、經費的來源肯定近代教育體系的建立，民眾也是相當重要，並非全然被動。藤井康子的博論〈1920年代における中等・高等教育と地域社会〉<sup>23</sup>，首先指出「島都」台北與地方都市有都市發展的差異，例如，中等、高等教育機關集中臺北市。她分析地方制度改正下，南部各地域展開的地域振興運動，藤井認為中等、高等教育機關作為文明化的象徵，也是地域發展的指標，由於其他地域相對地沒有被整備，造成進學者的不便。因此各地域中間層極力爭取設立中等、高等教育機關。

從許佩賢或藤井康子的研究，可看出民眾在教育方面的主動性，筆者想知道報上報導的緩和入學難運動或中等學校設立請願等運動，臺北地區究竟是哪些人參與？是否具備某些身分條件人士才會參與設立學校？又在南部地區中高等教育機關相對不足，因而地方極力爭取設校，在臺北地區，爭取設立中等教育機關的意義何在？是否與其他地域不同？

綜合上述，筆者將提出三點提問：

- 一、臺北地區的教育特色(初等、中等教育)
- 二、民眾對於中等教育的觀感與行動，例如升學的比率以及選擇升學的原因為何
- 三、面對中等教育機關的不足，民眾如何對應，並透過怎樣的管道與方式來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

本文試圖透過區域教育研究，解答上述問題。

### 第三節 史料與章節架構

#### (一) 史料與研究法

<sup>22</sup>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

<sup>23</sup> 藤井康子，〈1920年代 中等 高等教育 地域社 〉（京都：京都大學教育研究科教育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11）

## 官方檔案、統計書

欲探討臺北地區初等後教育狀況及升學情形，應先掌握法規及統計資料、臺北地區教育報告資料，如《臺灣總督府府報》（1896年8月20日至1942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903~1937年）、《臺灣總督府學事法規》（1896~1902年）、《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0年）、《臺灣學事一覽》（1923~1934年）、《臺北州學事一覽》（1926、1932、1935、1941年）。此外，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留用部分日人，協助整理日治舊檔案，編成《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其中有日治時期全臺各級學校班級、師生概況統計。也可對照參考。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收編自1895年5月至1945年10月之行政檔案，若欲究明政策、法規、制度制定經緯，或各項調查、統計、審查之原始記載，則可查閱公文類纂。《臺灣教育沿革誌》彙編至1936年的教育行政、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發展資料，也是相當重要的史料。

## 學校出版品

個別的學校檔案也是觀察一地域教育發展的重要資料，因此本文將運用《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一覽》（1933~1941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1927~1936、1939、1940年）、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一覽（1926、1938~1943年）、《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1940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一覽（1938年）、《私立臺北中學校一覽》、《私立臺灣商工學校一覽》（1920）《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工學校一覽》（1929、1931、1937）、《臺灣商工學校創立十五週年紀念號》、《臺灣商工學校創立二十週年紀念號》，補足學校發展並作為個案研究。

## 報紙雜誌、回憶錄

瞭解民眾的教育訴求或是地方大事，報章雜誌及回憶錄可補足官方資料的不足，故本文將運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教育會雜誌》，及時人回憶錄或口述資料如《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明治篇、大正篇、昭和篇）、《人生的三稜鏡》、《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二）、《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劉盛烈回憶錄》、《臺灣紳士許遠東》、《走

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訪問記錄》。

### 職員錄、人士鑑

本論文欲建構出臺北地區爭取教育資源人士的生平及關係，職員錄或人士鑑不可或缺，故將運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32~1934)、《臺灣官紳年鑑》(1932、1934)、《臺灣人士鑑》(1937)、《臺灣紳士名鑑》(1937)、《臺北州下產業組合役職員錄》(1933)、《南國之人士》、《大眾人士錄—外地海外篇》。

### 其他

日治時期出版品中與臺北地區發展相關者，例如，田中一二《臺北市史》、台北市役所出版《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戰後王詩琅編纂的《臺北市志》，其中關於日治時期的教育資料也可參考。又本文討論的三高女遷校擴校案個案，部分資料參考《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

## (二) 章節架構

本文共五章，除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論外，計分為三章。第二章「臺北市的初、中等教育發展與升學管道」，分析臺北市初中等教育狀況，歸納出臺北地區初等教育的特殊性，釐清自 1922 年的「臺灣教育令」頒布後，初等教育畢業者所擁有的升學管道，並就各種升學管道的志願者與錄取者觀察學生的選擇偏好，嘗試將初等後升學管道分類為正規升學管道與其他升學管道；第三章「初等教育畢業者的選擇」，討論臺籍學生升學的問題，首先分析初等教育畢業生的出路，再從學生家長的職業別、資產額分析升學者的家庭背景，最後從現有的口述或回憶錄等資料試著分析初等教育畢業者選擇升學，以及如何決定升學哪一類學校；第四章「民間的中等教育擴張訴求」從私立臺北國民中學設立與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遷校案，兩個案分析民眾爭取教育資源的過程，試圖勾勒官方與民間對於入學難、中等以上學校不足等教育問題的回應。而透過個案研究可看出日臺籍人士合作，或以臺籍人士為主軸的臺北地方政治。



## 第二章 臺北市的初、中等教育發展與升學管道

1898年公學校令頒布後，各地新式教育逐漸發展，就學人口緩慢增加，一般認為進入戰爭期，預備施行義務教育，臺籍學童就學率才快速增加，然而這樣的說法，以島都「臺北」為例，是否說的通呢？同時，1919年教育令頒布確立了學制，提高各級學校之教學程度。1922年再公布臺灣教育令，施行日臺共學制度。中等以上教育機構完全統一，採取共學方針，初等教育則依照常用語言的差異，區分為小學校和公學校。<sup>24</sup> 1922年後，臺北地區各中等學校日臺籍學生的就學情形如何？即臺北地區的中等學校升學空間為何？本章將從統計數據、教育沿革誌以及府報、市報，了解臺北地區初等、中等教育發展情形，歸納出臺北地區初中等教育的特殊性，以下先就臺北地區小公學校設立情形簡單介紹。

### 第一節 初等教育機關

#### 一、 臺北地區小公學校

##### (一) 初等教育機關校數與比率

由於本文所討論時間斷限，僅就1922年後臺北地區小公學校討論。至1922年臺北地區公學校有，臺北市老松公學校、臺北州士林公學校、臺北市太平公學校、大龍峒公學校、臺北州景尾公學校、臺北州松山公學校、臺北州北投公學校、臺北州社仔公學校、大安公學校、臺北州內湖公學校、臺北州木柵公學校、朱厝崙公學校、臺北市蓬萊公學校、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臺北市東園公學校、南港公學校、臺北市日新公學校、臺北州草山公學校、臺北龍山公學校，以及新設立的臺北市永樂公學校。至於1922年的小學校共有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臺北高等小學校、臺北市南門尋常小學校、臺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臺北壽尋常小學校、臺北州松山尋常小學校、臺北市建成尋常小學校。<sup>25</sup>

<sup>24</sup> 1919年的教育令制成一種與日本人完全不同之雙軌制教育系統，與日本人之教育分別施行，日本人教育機構完全依照日本內地教育制度辦理，臺灣人教育機構與日本人所有各級教育機構，既不能彼此聯繫，亦不能互相流轉，例如公學校畢業生，不能投考日本人之中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學生不能轉學入日本人之中學等。因此1919年的教育令，深為臺籍人士反對，臺灣總督府亦無法自圓其說。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46~47、50~52。

<sup>25</sup>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頁85~90。

其後 1925 年新設台北市大橋公學校，1929 年成立臺北州大安公學校，1929 年新設台北市錦尋常小學校，1933 年設立台北市幸尋常小學校，1934 年新設台北市宮前公學校，1936 年新設臺北州西松山公學校、臺北市堀江公學校，1937 年新設台北市圓山公學校，1939 年新設台北市河合公學校。

1941 年臺灣實施國民學校令，上述小公學校皆改名為國民學校，其中大龍峒公學校改名為臺北市大宮國民學校，朱厝崙公學校改名為臺北市中園國民學校，北投尋常小學校改名為北投國民學校，臺北州松山尋常小學校改名為臺北市雙葉國民學校，臺北州大安公學校改為臺北市富田國民學校，錦尋常小學校改名為臺北市昭和國民學校，臺北州西松山公學校改名為臺北市若松國民學校。1942 年新設臺北市明治國民學校，1943 年新設臺北市川端國民學校，1944 年新設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sup>26</sup>

台北地區至 1944 年共有 12 所小學校，同年全台灣共 155 所小學校，台北地區小學校佔全台灣 8%，又台北地區面積約只佔全台灣約 0.8%，相較之下，台北地區小學校設立比例甚高，至 1944 年，台北地區共有 35 所公學校(包括分教場)，廣大之宜蘭地區於 1944 年亦有 35 所公學校，1945 年臺北地區又新增兩個分教場，即「內湖國民學校洲尾分教場」和「南港國民學校後山坡分教場」，共 37 所公學校，同年高雄市僅 13 所公學校，<sup>27</sup> 可見台北地區公學校設立較為密集。

## (二) 本島人初等教育的高就學率

參照表 2-1 臺北地區在初等教育就學率與全島相比高出許多，1924 年臺北市的平均就學率已超過 55%，男子就學率更高達 75%。觀察表 2-1 可發現，1923 年後就學率不斷攀升，1924 年開始臺北市男子就學率平均超過 70%，至 1934 年女子就學率也超過 50%，臺北地區就學率呈現穩定成長並且長期高出全島就學率。從表 2-2 可知 1930 年至 1941 年臺北地區本島人學齡兒童男子成長近一萬人，女子增加約一萬兩千多人。為了讓更多學童就學，臺北市新設學校、增加班級數，自 1922 年後新設永樂公學校、大橋公學校、大安公學校、錦尋常小學校、幸尋常小學校、宮前公學校、西松山公學校、堀江公學校，圓山公學校，河合公學校。

從就學人口與不就學人口分析，臺北地區男子在 1930 年代就學人口不斷增加，不就學人口則維持在約三千人左右，女子就學人口也不斷增加，不就學人口

<sup>26</sup>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頁 91~92。

<sup>27</sup>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頁 98~101。

逐漸下降，1934年就學人口超過不就學人口，至1941年女子不就學人口降至3695人。要之，1920年代以降，迄1945年，臺北地區之就學率長期高於其他地區，且趨於穩定成長，因此，民眾對於中等以上教育之訴求和期待，亦較其他地區更為強烈。相較於全島，臺北地區初等教育高就學率為其特色，再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各市比較初等教育就學人口（表2-3），臺北市公學校收容空間遠大於其他市，並且逐年穩定成長，此為初等教育的特色。

表 2-1 日治時期全島與臺北市學齡兒童就學率（本島人）（%）

	全島			臺北市		
	男	女	平均	男	女	平均
1923	43.9	12.3	29.0	56.90	27.13	42.17
1924	43.8	12.7	29.1	75.57	35.02	55.32
1925	44.3	13.2	29.5	71.26	37.76	55.66
1926	43.3	13.1	28.9	69.43	32.48	50.34
1927	44.3	13.8	29.7	71.61	36.50	53.88
1928	45.0	14.4	30.3	71.92	40.24	56.48
1929	45.9	15.3	31.1	73.65	41.77	57.58
1930	48.9	16.6	33.1	73.65	41.77	57.07
1931	49.5	18.0	34.2	77.69	46.18	61.42
1932	51.0	19.7	35.9	77.61	47.02	61.54
1933	52.8	21.2	37.4	77.78	47.68	61.81
1934	54.7	23.0	39.3	77.82	50.29	63.52
1935	56.8	25.1	41.5	78.30	52.25	64.79
1936	59.1	27.4	43.8	78.46	55.23	66.54
1937	62.0	30.3	46.7	78.95	58.92	68.52
1938	64.5	34.1	49.8	80.39	65.68	72.88
1939	67.2	38.1	53.2	84.38	73.32	78.84
1940	70.6	48.5	61.5	87.11	77.34	82.16
1941	73.6	48.5	61.5	88.55	81.46	84.96

資料來源：《臺北市志卷三政制人口篇》、《臺北市統計書》、陳思琪，《日據時期台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頁62。

表 2-2 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本島人學齡兒童(1931-1941)

單位：人

	就學		不就學		就學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平均
1930	8394	5160	2773	7009	73.65	41.77	57.07
1931	9568	6074	2512	6841	77.69	46.18	61.42
1932	10183	6830	2680	7431	77.61	47.02	61.54
1933	10854	7449	2837	7889	77.78	47.68	61.81
1934	11665	8144	3053	7761	77.82	50.29	63.52
1935	12998	9360	3304	8248	78.30	52.25	64.79
1936	13717	10192	----	----	78.46	55.23	66.54
1937	15376	12057	4199	8408	78.95	58.92	68.52
1938	15757	13414	3550	6691	80.39	65.68	72.88
1939	17003	15338	2817	5228	84.38	73.32	78.84
1940	18109	16524	2379	4513	87.11	77.34	82.16
1941	18657	17570	2131	3695	88.55	81.46	84.96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昭和六年至昭和十六年，其中昭和十一年（1936）不就學人數男女分別為 17482 與 18425，遠超出平均，故不列入統計。

表 2-3 本島人於臺灣各市立公學校入學者

單位：人

	臺北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30	2040	1350	455	233	403	242	1383	826	356	158
1931	2100	1427	439	253	442	273	1302	886	485	238
1932	2043	1710	488	262	492	305	1495	930	517	262
1933	2300	1911	580	353	1109	716	1694	1099	1048	537
1934	2412	2011	532	332	1173	730	1620	1111	1088	631
1935	2540	2186	647	398	1195	773	1880	1282	1341	770
1936	2778	2508	721	475	1394	900	2134	1420	1335	719
1937	2988	2628	794	487	1418	1146	2268	1578	1440	906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 29 年到 36 年

當初等教育就學人口持續成長，初等後教育機構設立與招生情形又是如何？依據 1922 年頒布的臺灣教育令，小公學校畢業後的升學管道有：高等學校尋常科、師範學校本科、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實業補習學校。除中等教育機關外，尚有公學校高等科與高等小學校，由於公學校高等科與高等小學校在學制上屬於初等教育，其設立有其特殊性，過去研究較少，筆者將先從設立目的與教學科目、修業年限等簡述此升學管道。

## 二、 公學校高等科與尋常高等小學校

公學校高等科出現於大正 11(1922)年 2 月 6 日公布的新台灣教育令（敕令第 20 號），此次教育令為修正大正 8 年(1919)的臺灣教育令，在初等教育部分，修正要點為：

為內地人子弟設立小學校。其規定依內地小學校之規定，與先前相同。雖是本島人子弟，則僅限懂國語且進入小學校亦不妨礙小學校的兒童教養者，可依其希望就讀小學校。為本島人子弟設立公學校，依先前之公學校規定。又內地人子弟因家庭緣故而希望就讀公學校者，應認可之。

關於公學校，修正要點如下：

- (1)公學校之就學年齡改為六歲。
- (2)教學科目中增加日本歷史、手工，實業科目改為彈性科目。
- (3)公學校得設高等科或補習科。
- (4)高等科之修業年限為兩年，其入學資格為修業年限六年公學校畢業者，或具有同等以上學力者。
- (5)高等科之教學科目大體準據高等小學校。
- (6)補習科之規定準據小學校補習科之規定。<sup>28</sup>

此次教育令修正，乃因共學問題，最終官方認為本島之現況無差別教育之必要，因而修正。然而初等教育仍實施差別教育，小學校為常用日語者的初等普通教育，故日籍學童依舊入「小學校」，臺籍學童除少數進入「小學校」外，大多數仍就讀「公學校」。

公學校高等科設置大體準據高等小學校，依據大正 5 年（1915）發布的台灣高等小學校教學科目及教學準則：由於當時除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外，沒有針對內地人設置的實業補習學校、實業學校，因此對於未能就讀中學校及女學校的日籍學生，高等小學校成為唯一的教育機關。<sup>29</sup> 因此高等小學校可說是尋常小學校畢業生，未能升學中等學校的上級教育機關，如此類比公學校高等科，1922 年臺灣教育令下出現的公學校高等科，其實就是六年制公學校畢業生，未能升學中等學校的另一升學選擇，又從 1922 年的台灣教育令第七條記載：關於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六年之公學校畢業生視為尋常小學校畢業生，公學校高等科第一學年修

<sup>28</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2010），頁 47。

<sup>29</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203。

畢者及畢業生，分別視為高等小學校第一學年修畢者及修業年限二年之高等小學校畢業生。<sup>30</sup> 也明顯看出公學校高等科學歷等同於高等小學校學歷。

隨著六年制公學校臺籍學生就學數的穩定成長，無法升學上級學校者，公學校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成為另一選擇，另一方面，公學校高等科作為入學中等學校的準備教育，利用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就學期間，取得與小學校畢業生相等的學力(尤其是國語能力)，具有和日籍學生相同程度的學力再進入中等學校就讀，如此也可消除本島人的不公平感與疑慮。<sup>31</sup> 若再看公學校高等科的教學要旨，教學科目與公學校本科無異，僅是教材內容程度上的加深。<sup>32</sup>

1922 年教育令頒布，公學校高等科及高等小學校成為升學中等學校的準備教育，依據前述，1922 至 1940 年臺北地區的公學校教育，在學校數、班級及學生數都有顯著增加。1924 年的報導指出：臺北市至昨年度止，數年來每年拒絕千餘名的入學。……還有由報紙上看見如新竹街中壠庄也是不能全部收容、其他可以類推之。<sup>33</sup> 隨著公學校欲就學學童、入學學童的增加，公學校高等科提供的升學空間為何，相較於其他升學管道，其重要性又是如何？

表 2-4 為台北市統計書中公學校畢業生入學公學校高等科人數統計，與中學

<sup>30</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49。

<sup>31</sup> 末松內務局長，〈新 育令中公學校卒業生 小學校卒業生 同一 資格 與 理由〉，《臺灣教育》，n238（1922 年 3 月），頁 3~5。

<sup>32</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165-168。

第二十四條 修身……高等科應擴展前項意旨，力求更進一部堅固陶冶之功效。

第二十五條 國語……高等科應於稍深程度傳授說話法、讀法、寫法、作文。

第二十六條 算術……於高等科則針對前項之事稍微提高其程度授課之，須使其充分應用練習，並得依地方情況傳授日用簿記概要。

第二十七條 日本歷史……於高等科應擴大前項之意旨，始期稍微詳知我國發展事蹟。

第二十八條 地理……於高等科應先傳授各大洲之地勢、氣候、區劃、產業、交通等之概要，進而使其知曉與本國具有重要關係之諸國的地理概要、本國政治經濟狀態、相對於外國之地位等概要，且應傳授一般地文。

第二十九條 理科……於高等科應依據前項漸次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第三十條 畫圖……於高等科應依據前項，漸次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第三十一條 唱歌……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以稍高程度授之。

第三十二條 體操……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更進一步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第三十三條 實業科目

農業……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更進一步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商業……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更進一步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手工……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更進一步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第三十四條 裁縫及家事……於高等科應準據前項，更進一步提升其程度教授之。

第三十五條 漢文……於高等科應稍提高其程度傳授讀法、作文。

<sup>33</sup> 蔣渭水，〈反對建設臺灣大學〉，《臺灣民報》，第 2 卷第 18 號（1924 年 9 月），頁 1。

校入學數（表 2-5）以及實業學校入學者數（表 2-7）相比，1930 年代公學校高等科收容了更多的台籍男學生，具備更大的就學空間，尤其至戰爭期人數快速增長，1941 年公學校高等科男子入學數 708 人，女子 282 人，總人數幾乎是同年中等學校入學者的 3 倍，實業學校入學者總數約 9 倍。

表 2-4 公學校畢業後入學公學校高等科人數(1931~1941)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男	210	184	226	324	304	311	251	383	534	463	708
女	22	8	41	52	52	50	83	116	112	203	282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 第二節 中等教育機關

### 一、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

自 1922 年臺灣教育令頒布後，中等教育機構設立如下：臺北州立臺北第一、第二、第三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一、第二、第三高等女學校。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校舍位於龍口町，1920 年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1921 年該校由台灣總督府中學校變為臺北州立中學校，1922 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於幸町設立，臺北州立中學校更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1937 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三中學校於大安十二甲設立。<sup>34</sup>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前身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1917 年因台南高等女學校成立，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女學校。1919 年臺灣公立臺北高等女學校設立，該校與總督府臺北高等女學校不同，修業年限兩年，教學目的教授有關家政之知識技能，經費全由地方稅負擔，1921 年 4 月，改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修業年限、入學資格及課程，呈准依照高等女學校令辦理，至此與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制度完全一致。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前身為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919 年頒布臺灣教育令後改稱為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重頒臺灣教育令，改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sup>35</sup>

自 1919 年中等學校制度確立，1922 年共學制實施後，台北市各中等學校每年內臺學生就學人數如表 2-5，觀察入學者數可看出，1933 年後，臺北地區中學

<sup>34</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46~47、60。

<sup>35</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61。

校及高等女學校顯著增加。而從《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記錄，1934、1935年臺北第二高女逐年增加一學級，至1936年共有五學級；1934至1937年，第三高女學校新建；1934至1937年，第二中學校舍不斷增築，1936、1937年逐年增加一學級；1937年臺北第三中學新設。<sup>36</sup>再從入學志願者分析(表2-6)，1930年後，以台籍學生為主的第二中學、第三高女志願者數顯著增加。此時期新增的學級數與學校數，反應出進學空間的不足，而台籍學生志願者數的增長，更顯現民眾對於近代教育的渴求擴展到中等教育。然而在政策的主導下，中等教育的擴張相當緩慢(包括實業教育中的台北商業與臺北工業學校)，更多的公學校畢業生進入公學校高等科、實業補習學校或私立學校。

表 2-5 台北市中等學校入學者數（1922~1941）

	台北第一中學		台北第二中學		台北第三中學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入學者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22	186	5	29	71			共200		共47		9	131
1923	168	11	36	54			206	1	166	0	28	114
1924	164	15	26	68			194	3	99	1	27	113
1925	169	14	18	81			193	4	106	1	17	115
1926	180	12	16	78			196	3	103	1	30	112
1927	181	8	16	76			199	3	104	2	41	106
1928	183	7	33	62			194	5	108	0	26	125
1929	182	6	13	78			191	6	105	3	21	133
1930	192	9	19	75			199	4	106	3	34	117
1931	196	9	28	72			197	7	101	5	42	112
1932	197	11	23	75			203	3	106	2	36	118
1933	193	7	38	108			200	8	162	7	28	124
1934	190	7	41	104			202	5	223	7	25	130
1935	196	6	40	104			203	5	229	8	12	143
1936	197	6	40	104			203	5	210	8	12	143
1937	198	7	36	104	134	12	207	4	193	7	37	167
1938	198	7	36	104	126	19	207	4	193	7	37	167
1939	205	4	36	107	217	4	214	6	189	16	47	212
1940	202	5	37	109	130	17	239	5	216	8	12	195
1941	202	5	37	109	136	24	206	5	216	8	13	192

資料來源：1923、1925、1926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22、24、25 年)，1922、1924、

<sup>36</sup> 台北州役所編，《台灣省台北州管內概況及市務概要》(八)、(九)、(十)、(十一)，頁 103，頁 111，頁 111~112，頁 122。



1927~1930 臺灣學事一覽，1931~1941 臺北市統計書

表 2-6 台北市中等學校志願者數（1922~1941）

	臺北第一中學		臺北第二中學		臺北第三中學		臺北第一高等女		臺北第二高等女		臺北第三高等女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22	427	23	58	135			共351		共105		9	149
1923	357	40	98	321			303	2	166	0	36	214
1924	381	64	76	430			373	6	222	2	52	284
1925	367	70	76	430			236	6	209	11	35	234
1926	407	71	64	486			285	5	221	3	47	246
1927	409	63	39	389			288	8	192	3	59	204
1928	324	30	68	474			302	7	242	8	48	202
1929	382	22	50	418			305	8	232	8	48	216
1930	380	21	46	327			330	6	252	6	61	180
1931	367	30	96	349			326	14	265	10	93	239
1932	433	24	50	467			379	13	312	11	119	244
1933	428	15	116	591			408	12	368	12	119	327
1934	451	21	134	671			331	8	481	15	83	358
1935	451	15	112	604			300	7	550	18	56	361
1936	415	15	112	604			300	7	550	18	56	361
1937	268	18	64	632	226	56	332	9	561	14	84	466
1938	270	16	64	630	247	82	354	7	561	13	84	466
1939	337	9	95	819	376	7	564	15	563	55	303	747
1940	374	12	85	874	288	106	398	12	621	17	48	697
1941	374	12	85	872	333	122	365	12	621	17	42	815

資料來源：1923、1925、1926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22、24、25 年)，1922、1924、1927~1930 臺灣學事一覽，1931~1941 臺北市統計書

## 二、 工業學校與商業學校

日治領臺之初，對於臺灣實業教育，初期並無意願大力發展，臺灣陸續出現的實業教育機關有工學校附屬實業科、農業試驗場講習所、糖業講習所、工業講習所、林業講習所等。簡言之此時期的職業教育，「以應急的、暫時的、非正式的職業教育設施為主體，正規的職業教育仍未受重視。而且，台灣人、日本人的職業教育有所區別。」<sup>37</sup> 在 1919 年以前，日治臺灣實業教育，可分為國語學校

<sup>37</sup> 吳文星，〈日治前期台灣職業教育之建立與資源之開發〉，《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

實業部；附屬於公學校實業科；以及農、工、糖、林的講習制度。一方面依循內地發展的舊例，依附於國語學校及公學校中，相當於內地初期在小學校中增加農、工、商等專科的方式；另一方面，從講習制度的設立，可看出臺灣總督府採取臨時的、迅速可用的實業人才培養方式。<sup>38</sup>

至 1919 年「臺灣教育令」制定時，殖民政府一方面不願意增設高等普通教育系統，防止抽象教育助長植民地人民的文明意識，進而對統治發生阻礙；另一方面希望藉由教育帶動臺灣的產業發展，讓殖民地可以具備一定能力的生產技術以及優秀的勞力資源。實業教育系統便是在這個概念下被建設完備。此時期農業為臺灣最重要的產業，學校數（含簡易實業學校）增設最多；工業則希望內地子弟與臺灣子弟在教育內容上有所區隔，讓內地人成為具備高級技術的領導人員，臺灣子弟則提供初級勞力與技術能力；商業配合南支南洋政策，教授各種商業知識，以及東亞南洋的歷史、地理、商品等課程。<sup>39</sup> 至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臺灣實業教育體系正式與內地同軌，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共學制，各校招生對象不限定臺籍或日籍學生。臺北作為商工業重鎮都市，日治時期實業教育部分共設有三校：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以下簡述三校沿革與發展：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創設於 1917 年 5 月，初名為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專收日本學生之商業教育機構，修業年限豫科二年，本科三年，共五年。1921 年移管臺北州，改為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1922 年新教育令公布後，台北商業學校分為甲、乙兩科，甲科招收尋常小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五年，乙科招收高等小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三年。臺北州立商業學校在實施日臺共學後，歷年招收學生數幾為日籍學生，臺籍學生只佔個位數，也因此臺籍人士甚至會勸告自家子弟不用報考商業學校，專心準備中學校或工業學校甚至私立學校。

1936 年 6 月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創立，為夜間學校，招收高等小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定為四年。<sup>40</sup> 本校原為台北商業學校增設之夜間部，昭和五

---

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80。

<sup>38</sup> 金柏全，〈日治時期台灣實業教育之變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41。

<sup>39</sup> 金柏全，〈日治時期台灣實業教育之變遷〉，頁 68。

<sup>40</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64。

年(1930)年開始，台北商業學校增設夜間講習，招收七十名學生。夜間講習招生條件為尋常小學校或公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講習時間為每周一、三、五晚上六點至九點。講習科目有：公民科、體操、商業、簿記、珠算、交通、地理、商品、商業實踐。設立目的是為小公學校畢業後，無法進入上級學校者，開設夜間商業講習所。<sup>41</sup>1936 年夜間講習所改制為台北第二商業學校，仍維持夜間講習所的形式。每夜授課四小時，畢業後可取得甲種商業學校學歷。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為 1909 年設立工業講習所，1919 年改稱為公立臺北工業學校，修業年限三年，為本島人的工業教育機構；1918 年另設有台灣總督府工業學校，修業年限五年，招收日籍學生。1921 年地方制度改正，所有實業學校移轉州，台灣總督府工業學校改稱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一工業學校，公立臺北工業學校改稱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工業學校。1923 年由於共學制實施，兩校合併為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本科修業年限五年，分機械、土木、電氣、應用化學及建築五科，另設修業年限三年之專修科，科目與本科同。而合併前的臺北第二工業學校在學生，比照從前規定辦理，故保留原有之家具及金屬細工兩科。<sup>42</sup>

日治實業教育於 1922 至 1928 年間，實業補習學校快速增加，此波主要增設農業補習學校，著重在農業教育，培養農業人材；直到 1937 年戰時體制下偏重工業人材培育，工業學校的校數與學生數增加最多。<sup>43</sup> 台北市的商業學校及工業學校自 1934 至 1937 年每年增加一班，並增築校舍以有足夠空間收容學生。<sup>44</sup> 從學生入學者數觀之，臺北商業學校 1934 年增收學生約五十名，工業學校自 1935 年入學者數逐漸增加，1937 年臺北商業學校夜間講習科昇格為臺北第二商業學校。1930 年代，儘管臺北各實業學校增設學級數，並增設第二商業學校，增設的就學空間幾乎都被日籍學生佔去，比起中學校，臺籍學生在實業教育的就學空間，反而更被限縮。然而從臺北工業學校與第二商業學校高額の志願者數，或許可以再思考此時期學生選擇升學，畢業後的就業與否、職業薪水也是相當重要的誘因。

表 2-7 台北市實業學校志願者數及入學者數（1922~1941）

<sup>41</sup> 〈商業工業夜間講習募集〉，《台灣日日新報》，1931 年 3 月 25 日，夕刊 04，第 11116 號。

<sup>42</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63。

<sup>43</sup> 金柏全，〈日治時期台灣實業教育之變遷〉，頁 117~118。

<sup>44</sup> 台北州役所編，《台灣省台北州管內概況及市務概要》(八)、(九)、(十)、(十一)，頁 103，頁 111，頁 111~112，頁 122。

	臺北商業學校				臺北第一工業學校 本科				臺北第二商業學校			
	志願者數		入學者數		志願者數		入學者數		志願者數		入學者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22	274	74	76	6	第一198 第二101	87 525	65 19	12 64				
1923	280	64	90	4	342	459	86	45				
1924	270	64	79	5	332	572	117	21				
1925	195	72	83	6	286	571	95	37				
1926	273	98	83	8	277	400	93	33				
1927	219	122	85	9	286	436	79	35				
1928	260	128	132	16	294	538	96	32				
1929	269	138	117	22	341	460	73	54				
1930	297	123	120	30	288	407	113	26				
1931	286	95	124	12	290	375	104	21				
1932	327	63	139	7	374	322	105	36				
1933	445	38	147	5	405	496	123	50				
1934	545	51	188	13	341	427	138	60				
1935	597	67	190	10	319	517	154	63				
1936	597	69	190	10	368	671	196	46				
1937	438	66	183	8	385	633	184	63	89	101	65	31
1938	319	77	181	8	349	596	192	76	140	178	70	32
1939	288	106	130	17	319	76	181	8	271	187	36	4
1940	363	89	193	7	375	653	200	49	104	286	46	48
1941	334	114	189	9	375	653	200	49	92	366	56	48

資料來源：1923、1925、1926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22、24、25 年)，1922、1924、1927~1930 臺灣學事一覽，1931~1941 臺北市統計書

### 三、 實業補習學校

#### (一)實業補習學校的設立

所謂實業補習學校是對於初等教育（小學校、公學校）畢業者，授予相關職業知識技能與國民生活必須的教育。<sup>45</sup> 這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體認到實業補習教育的必要性，英美德等國開始確立補習教育的義務制，日本也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展實業補習教育。<sup>46</sup> 依據大正元年（1912）改正的台灣公學校規則，修業年限 6 年的公學校附設 2 年制的實業科。大正 8 年（1919）將現存

<sup>45</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902。

<sup>46</sup> 佚名，〈實業補習教育 振興 論〉，《台灣教育》，第 351 號（1931 年 10 月），頁 41。

公學校實業科改名為簡易實業學校，<sup>47</sup> 大正 11 年（1922）新「台灣教育令」頒布，同時發布台灣公立實業補習學校規則（府令第 79 號），並廢止大正 8 年的府令第 48 號台灣公立簡易實業學校規則，過去的簡易實業學校改稱為實業補習學校。<sup>48</sup>

實業補習學校從最初的公學校實業科，1919 年更名並獨立成為簡易實業學校，1922 年的新台灣教育令，更名為實業補習學校，確立了初等教育後，實業補習學校的升學管道，從 1922 年的法規來看，實業補習學校可說是因地制宜的職業教育，修業年限較短，必修科目少，選修科目多，入學資格與上課時間相當具彈性，並設立臨時講習讓畢業生充分練習。

實業補習學校雖分為農業、商業和工業，但在 1920 年代，農業補習學校佔壓倒性的多數，直到 1935 年，工業、商工業補習學校才逐漸增加。<sup>49</sup> 臺北市直到 1937 年才成立第一所公立實業補習學校，即臺北家政女學校，1940 年又設立臺北商工專修學校。

1935 年日本頒布青年學校令，將實業補習學校與青年訓練所合併為青年學校，然而台灣因為諸種情形與內地不同，因此保留了實業補習學校。<sup>50</sup> 台灣的實業補習學校亦是一異於日本內地的體制，儘管實業補習學校與青年學校分設，當時的文教局長卻認為，對畢業生指導演講的同時，更能普及於一般青年，台灣的實業補習學校可成為真正的青年教養中心機關。<sup>51</sup> 可見實業補習學校除培育基層產業人材，也具有教養青年的功能。

## (二)臺北地區實業補習學校

前對已論述 1935 年統治者對實業補習學校政策的走向與設立目標，在此大環境下，臺北地區先後僅設立臺北家政女學校及臺北商工專修學校，課程內容與招募情形如何？

### (1) 臺北家政女學校設立

<sup>47</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893。

<sup>48</sup>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臺北：台灣日日新報社），頁 524。

<sup>49</sup> 王榮，〈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業補習學校〉，《東洋史訪》，（神戶；兵庫教育大東洋史研究，2001）頁 34，

<sup>50</sup> 文教局長，〈實業補習學校規則 改正 就 〉，《台灣教育》，第 394 號，頁 77。實際上台灣尚無法實施青年學校主要因為徵兵制尚未推行。

<sup>51</sup> 文教局長，〈實業補習學校規則 改正 就 〉，《台灣教育》，第 394 號，頁 78。

1935年12月20日的日日新報中出現時人提出「商工專修學校新設，希望也能設立家政女學校」的陳情。<sup>52</sup>，可見家政女學校與商工專修學校的設立專修學校的設立，乃為緩和中學校入學困難問題。<sup>53</sup>

根據1937年公布的臺北家政女學校學則，臺北家政女學校基於台灣公立實業補習學校規則設立，授予女子家事裁縫及技藝相關必要的知識技能，並施以國民生活必要的教育以涵養婦德為目的。教學科目為：修身公民科、國語、數學、家事、國史、裁縫手藝、圖畫、音樂、體操及選修花道、茶道、園藝。第一學年授課時數33節，裁縫手藝佔15節，接下來為國語4節，家事、體操各3節；第二學年35節，家事增加為4節，其餘科目時數照舊；第三學年35節，家事再增加為6節，沒有圖畫課，其餘依舊。<sup>54</sup>對於此授課內容，時人評為與其說是實科學校，不如說是具有新娘學校的性質，以培養畢業後成為家庭主婦為目的。<sup>55</sup>

## (2) 臺北商工專修學校設立

1940年設立的臺北商工專修學校，對於商業及工業從事者培養其相關知識技能並授予國民生活必要教育，修業年限三年，入學資格為尋常小學校或修業年限六年之公學校畢業生，學費一年九圓，分三學期徵收。分為商業科及工業科，工業科再分為機械科及電工科，<sup>56</sup>商業科招募五十人，機械科及工業科各招募三十人。<sup>57</sup>相較於家政女學校，臺北商工專修學校相當重視實習課程，商業科每學年每週授課38節，商事要項佔11節，國語8節，數學6節，實習及作業6節；工業科第一學年每週授課38節，製圖實習課程佔14節，第二學年增為20節，第三學年也佔20節，機械科與電工科皆如此。商業科實習課成約佔1/6，工業科則佔1/2左右。

1940年之所以設立臺北商工專修學校，根據設立理由書，理由有三點：基

<sup>52</sup> 〈商工專修學校 新設 度 家政女學校 欲 谷口氏 希望開陳〉，《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12月20日，02，第12833號。

<sup>53</sup> 〈臺北市立家政女校 按四月十五日開校 募第一學年生徒百名〉，《台灣日日新報》，1937年3月9日，08，第13274號。

<sup>54</sup> 臺北市役所〈臺北家政女學校學則〉，《臺北市報》，第538號，（1937年3月20日），頁35。

<sup>55</sup> 榎本美由紀，〈日治時期台灣家政教育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0，頁9，2000年7月。

<sup>56</sup> 臺北市役所，〈臺北商工專修學校學則左 通定 〉，《臺北市報》，第698號，（1940年4月3日），頁35-37。

<sup>57</sup> 臺北市役所，〈臺北商工專修學校生徒募集〉，《臺北市報》，第698號（1940年4月3日），頁47。

於時勢要求、基於中等學校入學狀況、基於教育思潮，撇開教育思潮較為抽象的概念，從現實層面來看，是基於國策與台北市都市發展考量，特別缺乏機械電氣人才，因而設立包含機械科、電工科、商業科的商工專修學校。並且由於中等學校入學難現況，加以考量實務發展，因此增設實業補習學校而非普通中學。

表 2-8 為兩校設立後的報名人數與錄取人數，家政女學校報名者以內地人為多數，錄取名額臺籍女學生少。商工專修學校則是報名者臺籍遠超過日籍，錄取名額日臺籍各半。

表 2-8 臺北市實業補習學校入學志願者及許可數

	臺北家政女學校				臺北商工專修學校			
	志願者數		許可數		志願者數		許可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39	363	69	156	12	—	—	—	—
1940	490	51	225	6	71	620	53	65
1941	481	76	198	20	77	656	41	75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昭和 14 年，頁 43，昭和 15 年，頁 43，昭和 16 年，頁 45，臺北市役所。

實業補習學校自 1922 年確立以來，至 1935 年實業補習學校規則改正，主要以農業補習學校為主，在台北州共有三所農業補習學校，<sup>58</sup> 其入學率幾乎百分之百，隨著日本國策的轉變，臺北都市工商業成長發展，以及公學校畢業生的增長，中等學校入學難現象，1937 年臺北設立了家政女學校試圖緩和入學難現象，家政女學校作為職業教育，實則被批評為「中產階級的新娘學校」，由於學費便宜，修業年限不長，校名有「女學校」，社會上趨之若鶩。<sup>59</sup> 若說為緩和入學難現象，實際上受益者為日籍女學生；而入學志願者數為入學者的兩倍多，仍能解釋此時期家長及女學生對於中等學歷的渴求。1940 年設立的臺北商工專修學校除為緩和入學難現象，也為了培養更多工商業基層人材，從入學志願者數來看，

<sup>58</sup> 三所分別為金山農業補習學校、木柵農業補習學校、和尚洲農業補習學校。金山農業補習學校位於臺北州基隆郡金山庄，木柵農業補習學校位在臺北州文山郡深坑庄，和尚洲農業補習學校位在臺北州新莊郡鷺州庄。

<sup>59</sup> 榎本美由紀，〈日治時期台灣家政教育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0（2000 年 7 月），頁 12。

臺籍學生相當踴躍，儘管入學率日籍學生高出許多，但入學者數臺籍學生多於日籍學生，與臺北工業學校、商業學校比較起來，實業補習學校修業年限短，花費較少，畢業即具備商工技能而就業，對於 1940 年代的公學校畢業生，相當物超所值；因此，甫一設立，志願者數眾多，並且入學者數更達收容量的一半，甚至多於臺北工業學校臺籍學生入學數。

#### 四、 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指的是私人所立書房外的教育機構，日本領臺之初設立的私立學校，多為從軍布教師所設立的日本語學校，初期由於私立學校規程尚未發布，學校設立核准由所在地方官廳決定。當時核准學校有本部願寺的龍谷學校、兼松磯熊申請的日語學校、小柴豐嶽申請的共立學校、曹洞宗佛教會附屬日本語學校。此時的私立學校多因經費困難，而陸續停辦。1898 年 1 月公布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規程公布後紛紛設立了東門學校(1899)、臺北學院(1900)、臺北簡易商工學校(1900)、臺灣學習會(1904)。<sup>60</sup> 1905 年 11 月發布私立學校規則，此次規則發布後，臺北市內認可的私立學校有：私立臺北中學會、深坑街私立臺灣語學校、私立臺灣學習會、私立臺北簡易商工學校、私立臺北學院、峽謙齊私立專門學校(東門學校)、淡水私立牛津學堂。1908 年東門學校與私立臺灣學習會合併，改稱為私立成淵學校。<sup>61</sup>

1919 年公布之臺灣教育令規定專門學校及師範學校為官立，公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為官立或公立，先前設立者可維持原狀，但未來私人可設立者僅限於實業學校、簡易實業學校、特殊學校。1922 年再頒布的私立學校規則(府令第一三八號)中提到：私人欲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或專門學校，須具備可維持該學校之孳生收入的資產及設備，或其所需資金，並須成立財團法人。<sup>62</sup> 私立學校經費不比公立學校充足，然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有數間著名私立學校，至 1938 年台北市私立學校可分為四類：補習教育、中等教育、實業教育、其他。(一)補習教育：補習教育為成淵學校豫科，修業兩年終了後可直升

<sup>60</sup> 1899 年 2 月峽謙齊在南門街設立小學校程度之東門學校，修業年限三年；1900 年 7 月藤井乾助在府中街設立教授普通學、法律、經濟之臺北學院，修業年限二年；同年八月二好重彥在府後街設立臺北簡易商工學校，修業年限二年；1904 年 4 月，守屋善兵衛在文武街設立教授小學課程之臺灣學習會，修業年限三年。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45。

<sup>61</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 516、518。

<sup>62</sup> 臺灣教育會，許錫慶譯註，《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 450。



本科；(二)中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學校有國民中學、靜修女學校、臺北成淵學校三校。臺北成淵學校有夜間部，專為白天在官衙、銀行、公司工作的人設立，修業年限五年。靜修女學校維西班牙天主教會所經營的學校，分為高等女學校及宗教科，授予女子高等普通教育。(三)實業教育：授予實業教學的有臺灣商工學校與吉見裁縫學園，臺灣商工學校由財團法人東洋協會設立，分商科、工科，修業年限三年。(四)其他：其他私立學校有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及臺北神學校。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由財團法人台灣教育會設立，入學資格為高等女學校畢業或同程度者，修業時限本科三年，研究科一年；臺北神學校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經營，傳授本島人基督教神學，以培養該教會牧師為目的。修業年限本科四年，豫科一年。<sup>63</sup> 以下就各校沿革簡述之：

私立成淵學校創立於 1908 年，創設者為高橋辰次郎，以教授小學課程、中學課程，及實業補習課程為目的，重要功課多在夜間，故延請各校名師來校兼課，在學者亦多業務人員利用工作之餘進修，在私立學校中聲名良好，成績顯著。

臺北神學校創立於 1908 年 12 月 28 日，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師偕叻廉 (George William Mackay) 經營，以傳授臺人基督教神學，養成教會牧師為目的，修業年限本科四年，豫科一年。

1916 年曹洞宗僧侶創立台灣佛教中學林，1922 年改名為私立曹洞宗中學林，原以招收志願歸依佛門青年為宗旨，所有教員亦多僧侶充任。1935 年改名私立台北中學，逐漸轉變為一般教育機構色彩，學生亦逐年增加。

靜修女學校設立於 1917 年，由大稻埕天主教會創建，以施行高等女學校教育為目的。<sup>64</sup> 為內地人與台灣人同校共讀。學習年限四年，課程費用為一個月五十錢，第一年度各科共招收三十名學生，學校住宿費連同餐費約六至七圓。教學分為為日本子女所設的第一部課程，有修身、國語、數學、日本歷史、地理、家事、裁縫、圖畫及手藝、唱歌、體操等。其中，裁縫課的時數最多，跟內地技能科女學校的課程很類似。而為本島人子女所設的第二部，除了以上科目，還將重點放在國語教育。

1917 年另有木村匡發起組織的財團法人商工學校，最初名為臺灣商工學校。該校設立目的在培養活動於華南及南洋方面之實務家，修業年限三年的乙種

<sup>63</sup> 臺北市役所編，《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40 年）頁 369。

<sup>64</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 71。

實業學校，也為最初施行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學制之學校。1917年開校時，僅有二學級，教員27名，學生66名中內地人36名，本島人30名，由於學校逐漸發達，本島人學生也逐漸增加，至1939年因工、商兩科人數增多，為管理方便起見，乃改組為兩校，皆以開南為校名。至1943年，開南工業學校共6學級，學生375名中，本島人347名，日本人24名、朝鮮人1名、華僑3名。

吉見裁縫學園創立於1930年4月，創立者吉見滿津與，以教授裁縫為目的，修業年限一年，1941年計有八學級，學生400名，臺籍學生397人，日本人3名。1935年4月，為振興中等教育，緩和入學難，安田勝次郎及鈴木重嶽創立國民中學校。<sup>65</sup> 有關私立國民中學設立運動，將於本論文第四章討論。

## (二)台北地區私立中學就學空間

從私立中學校入學許可數分析，1930年代台北地區的私立中學校，相對於正規升學管道的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就學空間更大，更能收容台籍學生，例如具有中等教育性質的成淵學校學生數一直高於官立中學校；1935年新設的私立台北國民中學台籍學生更是明顯地多；以女子中等教育為辦學主旨的靜修女學校，台籍學生數自1935年顯著增加，收容數達第三高女的一半。具有實業教育性質的臺灣商工學校、私立吉見裁縫學園，台籍學生顯著高於日籍學生。可以說日治時期正規升學管道幾乎以日籍學生優先，台籍學生只能選擇非正規的升學空間。

表 2-9 私立中學校入學許可數(1931~1941)

時間	台灣商工學校 (1939年改為開南商業、開南工業學校)		曹洞宗中林(私立台北中學)		成淵學校		靜修女學校		私立台北國民中學		女子職業學校(1935年改名私立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		私立吉見裁縫學園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內地人	台灣人
1931	90	125	2	42	190	263	101	29	—	—	63	5	—	—
1932	72	112	2	44	67	132	103	17	—	—	54	6	—	—
1933	88	104	3	62	141	170	173	39	—	—	58	5	—	—
1934	89	115	2	60	182	271	173	38	—	—	131	15	—	—
1935	82	133	3	97	135	275	132	82	69	51	116	12	40	26
1936	82	133	3	97	135	275	104	88	65	57	116	12	32	48
1937	89	147	6	159	95	291	119	67	25	95	—	—	27	111
1938	89	147	—	—	61	302	109	85	30	95	—	—	27	109
1939	29	212	—	—	32	218	107	100	42	75	—	—	29	102
1940	38	330	—	—	18	403	112	98	39	124	—	—	43	125
1941	16	392	—	—	44	310	120	90	46	117	—	—	20	79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sup>65</sup>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頁70~72。

前述公學校高等科收容較多的台籍學生，若依據表 2-10 私立中學校入學許可數，1930 年代台籍學生入學私立中學校人數超過公學校高等科，可見私立學校的就學空間更大。從入學者觀察，1936 年後台北市日籍學生就讀私立學校者逐漸減少，但台籍學生數卻不減反增，1940 年更比 1939 年增加了 397 個名額；志願者數方面，日籍志願者數在 1937 年驟降，台籍志願者則分別在 1935、1937 年驟升，1935 年私立國民中學校創設，1937 年台北第三中學、台北第二商業學校初設。這些學校的新設提供了更多就學機會，也代表日台籍學生擁有更多選擇機會。

表 2-10 私立中學校志願者及入學許可數者變化(1931~1941)

時間	志願者數		入學者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31	780	1117	486	509
1932	591	972	298	311
1933	944	1476	463	379
1934	941	1647	577	499
1935	978	2329	577	676
1936	928	2418	537	710
1937	541	3149	361	873
1938	492	2921	316	742
1939	388	2173	239	710
1940	455	2939	269	1107
1941	465	3215	288	1071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1919 年臺灣教育令公布後，正式確立臺灣的學制，建立初等—中等—高等的升學路徑，初等教育畢業後的升學管道有：高等學校尋常科、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師範學校本科、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實業補習學校、私立學校；除中等教育機關外，尚有公學校高等科與高等小學校。筆者再將其分為正規升學管道及其他。所謂正規升學管道即小公學校—高等學校尋常科/中學校—高等學校高等科—大學這樣的升學路徑。若考上中學校需就讀五年，再考上高等學

校高等科需就讀三年，再考上大學需讀三年才能畢業工作；若是考上高等學校尋常科直升高等科共讀七年，再直升大學就讀三年畢業，如此升學途徑所花費的時間金錢不少。若是考上師範學校本科、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就讀五年後畢業便可投入職場，其中又以師範學校畢業後可當老師最為熱門，其次為工業學校或農林學校，又臺北地區無農林學校，臺北商業學校幾乎只收日人，因此每年臺北工業學校入學考試，臺籍學生報名踴躍。至於實業補習學校，臺北地區直到 1937 年才設立臺北家政女學校，1940 年設立臺北商工專修學校，家政女學校在報考人數上為錄取者的兩倍，商工專修學校則將近七倍。由於實業補習學校修業年限短，畢業後可儘快投入職場，故商工專修學校報名人數數倍於錄取者數。大體來說，能升學中學校、商業、工業學校為少數。臺籍學生主要升學私立學校或公學校高等科。

### 第三章 初等教育畢業者的選擇

本章欲從統計資料，以臺籍學童為中心，統計初等教育畢業者的出路選擇，配合各上級升學學校報名者人數的增減情形，觀察升學風潮與供需失衡現象。並從現存學校一覽分析臺籍升學者的家庭背景，試圖釐清此時期怎樣家庭背景得以支持學童升學，最後採用口述訪談與回憶錄資料中，此時期升學者的升學經驗，分析升學者的動機，雖僅是部分臺籍人士的人生經歷，但或可稍微瞭解 1930 年代畢業者選擇升學的動機與意義。

#### 第一節 公學校畢業生的出路

##### 一、升學、就業與無業

前章已知臺北地區公學校就學率高，以及公學校就學者數遠高於其他各市。本節欲探討 1930 年代初等教育畢業者的就學與不就學情形，筆者根據《臺北市統計書》將公學校本科畢業生分為升學、就業（工作）、從事家事及無業四種出路，此外，考慮到性別因素，筆者將男女畢業生分開觀察。

表 3-1 為 1924 至 1935 年公學校入學許可數與 1930 至 1941 年的畢業生人數統計表，兩者再推估出畢業率。從表 3-1 可知臺北地區公學校畢業生，就學人數逐年增加，畢業者也逐年增加，男子畢業率與女子不相上下，初期男子畢業生人數約為女子兩倍，至 1941 年男子僅為女子的 1.2 倍，這代表女子就學人口的成長，顯示在臺北地區除了男子公學校畢業生的成長，女子就學人數與畢業數的增長更加顯著。不論男女，入學後約有 75% 能畢業，中輟率約 25%。

表 3-1 公學校學生推估畢業率（本科）

單位：人

入學年	入學許可數		畢業數		畢業年	畢業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24	1752	944	1089	537	1930	62	57
1925	1262	747	1003	589	1931	79	79
1926	1084	627	1013	540	1932	93	86
1927	1428	771	1120	612	1933	78	79
1928	1946	1141	1416	844	1934	73	74
1929	1707	1186	1411	985	1935	83	83
1930	1882	1066	1436	944	1936	76	89
1931	1763	1218	1489	1098	1937	84	90
1932	1910	1676	1676	1316	1938	88	79
1933	2077	1689	1830	1504	1939	88	89
1934	2227	1935	2193	1812	1940	98	94
1935	2405	2171	2408	2088	1941	100	96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都市地區除了高就學率外，中輟率較低也是特色之一。瞭解此項事實後，再來討論公學校畢業生的出路。表 3-2 為 1930 年代男子公學校畢業生的狀況，表 3-3 為女子公學校畢業生的狀況。其中升學包含就讀公學校高等科、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師範學校及各種學校；工作指的是受雇於公家機關或私人公司的支薪工作；從事家務指的是從事家庭生產等活動，例如男子幫忙農務，女子幫忙家事或家庭副業。無職業或不詳可能是失業或其他，有可能不確定職業，或家有田產依收租過活，也有可能至內地留學。

1930 年代公學校畢業生中男子升學者約占 30%，至戰爭時期達 36%；而公學校畢業生畢業後主要進入職場工作，約占 40%；從事家事人口初期約占 20% 左右；無職業或不詳至 1934 年占 15%，其後降至 10% 以下；1938 年後有超過五成畢業生畢業後工作；同時期從事家務或無職業不詳者比率銳減，可推測此時期社會上需要大量勞動人口，就業機會增加。

表 3-2 公學校本科畢業後狀況(男)

畢業後 出路	畢業者	升學		工作（幫傭、 官公署僱員或 其他僱員）		從事家務		無職業或不詳 （含死亡）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931	1003	276	27.5	394	39.3	153	15.2	181	18.0
1932	1013	265	26.2	415	41.0	165	16.2	168	16.6
1933	1120	315	28.1	403	36.0	209	18.7	193	17.2
1934	1416	457	32.3	577	40.7	219	15.5	163	11.5
1935	1411	418	29.6	625	44.3	282	20.0	86	6.1
1936	1436	404	28.1	525	36.6	373	26.0	134	9.3
1937	1489	393	26.4	613	41.2	410	27.5	73	4.9
1938	1676	485	28.9	1029	61.4	134	8.0	28	1.7
1939	1830	670	36.6	988	54.0	59	3.2	113	6.2
1940	2193	642	29.3	1246	56.8	157	7.2	148	6.7
1941	2408	905	37.6	1180	49.0	184	7.7	139	5.7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至於女子公學校畢業生升學比率約占 17%，至 1940 年才突破 20%；初期畢業後工作比率約占 20%，從事家事人口也占約 20%，無職業或不詳在 1930 年代初期高達 40%，然而女子公學校畢業後工作者比率逐年升高，無職業或不詳逐年降低，至 1941 年，公學校女學生畢業後工作人口比率達 52.6%，無職業或不詳比率為 10.2%，從事家務者比率也降至 15%。

不論男女，公學校畢業後工作比率都逐年增加，從事家事與無業情形不斷減少，至於升學情形男女比率皆有成長，男子升學比率至統治末期達到 37.6%，女子則達到 22.2%。可以說在台北地區，1930 年代初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學生畢業後多在家幫忙或無法出外工作，然而隨著公學校女學校就業人口的增長，或可視為新式教育的注入帶動傳統價值觀的改變，更多女性從家庭釋出投入職場，取代無職業與從事家務。

表 3-3 公學校本科畢業後狀況(女)

畢業 後出 路	畢業者	升學		工作（幫傭、 官公署僱員或 其他僱員）		從事家務		無職業或不詳 （含死亡）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931	589	101	17.1	109	18.5	114	19.4	265	45.0
1932	540	77	14.3	146	27.1	137	25.3	180	33.3
1933	612	110	18.0	132	21.6	120	19.6	249	40.7
1934	844	150	17.8	201	23.8	231	27.4	262	31.0
1935	985	142	14.4	266	27.0	310	31.5	267	27.1
1936	944	135	14.3	340	36.0	259	27.4	210	22.3
1937	1098	196	17.9	434	39.5	190	17.3	278	25.3
1938	1316	234	17.8	565	42.9	189	14.4	328	24.9
1939	1504	226	15.0	850	56.5	29	1.9	399	26.5
1940	1812	372	20.5	1146	63.2	45	2.5	249	13.7
1941	2088	463	22.2	1098	52.6	315	15.0	214	10.2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 二、公學校高等科（高等小學校）的意義

### 1.公學校畢業者主要升學管道

上述升學人口中，男子以就讀公學校高等科為最大宗。1930 至 1935 年女子升學者中就讀高等女學校人數超過 50%（參照表 3-4），然而隨著畢業者數的增加，高等女學校可收容學生數有限，對於公學校女學生而言，就讀高等科成為無法升學高等女學校外的另一管道。1937 年女子就讀高等科人數幾乎同於就讀高等女學校人數，1938 年後，就讀高等科比率幾乎過半。至於男子升學人口以就讀高等科為主，比率達七成。1930 年代公學校高等科的升學率，男子就讀者約七成，女子自 1937 年後達到五成，可說公學校高等科為公學校畢業生的重要升學管道。



表 3-4 公學校畢業生主要升學管道所佔比率

	男			女				
	升學人口	就讀高等科	比率 (%)	升學人口	就讀高等科	比率 (%)	就讀高等女學校	比率 (%)
1931	276	210	76	101	22	22	67	66
1932	265	184	69	77	8	10	58	75
1933	315	226	72	110	41	37	59	54
1934	457	324	71	150	52	35	88	59
1935	418	304	73	142	52	37	75	53
1936	404	311	77	135	50	37	60	44
1937	393	251	64	196	83	42	85	43
1938	485	383	79	234	116	50	85	36
1939	670	534	80	226	112	50	97	43
1940	642	463	72	372	203	55	143	38
1941	905	708	78	463	282	61	142	31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1

## 2. 上級學校的準備教育

公學校高等科除作為公學校畢業生重要的升學管道，對於男子而言，公學校畢業後，若無法考進中學校、實業學校或師範學校，就讀公學校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具有補習效果，可一邊再準備正規學校的升學考試，一邊緩衝畢業即失業的情形。根據一些日治時期就讀臺北工業學校受訪者的回憶錄，提到高等科類似一種預備校，小公學校畢業後沒有考上學校，可以進入高等科就讀作為緩衝，之後再報考其他學校。<sup>66</sup> 又例如受過日式教育的曹永和院士，1933年太平公學校畢業後，報考臺北二中，由於那年表現失常落榜。當時曹永和先生為了升學，在未廣高等小學校繼續唸一年，以便來年重考。<sup>67</sup> 表 3-5 為臺北第二中學學生入學前學歷分析，筆者僅採用一年級新生統計。將高等小學校、公學校高等科第一學年修了者或畢業者合計，可發現占每年入學新生 50% 以上，1935 年後，高等科

<sup>66</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二）》（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11 年），頁 16。

<sup>67</sup>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臺北市：中研院台史所，2010 年），頁 26。

一年級修畢占入學者最多。

表 3-5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入學前學歷

	尋常小學校畢業		高等小學校第一學年修畢		高等小學校畢業		公學校畢業(六年)	公學校高等科第一學年修畢	公學校高等科畢業	計	
	內	臺	內	臺	內	臺				內	臺
1933	10	10	13	8	3	4	30	19	8	26	79
1934	19	7	14	8	10	1	49	31	15	43	111
1935	30	7	16	8	0	5	26	54	7	46	108
1936	32	11	12	4	3	0	39	43	9	47	106
1937	38	9	13	6	2	3	25	57	3	53	103
1938	23	14	14	13	3	0	30	46	7	42	110
1939	32	20	10	3	6	1	28	46	5	49	103
1940	30	21	11	4	5	0	48	35	1	47	109
1941	28	19	15	7	3	0	34	46	3	46	109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一覽》1933~1941

附註：1938 年內地入學者中，一為公學校高等科第一學年修了，一為轉學者。

1939、1940 年內地人轉學者一。

1928 年出生的王世慶先生，回憶起幼時的升學情形，說到升學中等學校者的學歷比例，「當時中等學校每校每年只招二至三班，約一百到一百五十個學生，考上的人當中高等科一年級肄業生約占 60%，高等科二年級畢業生約占 25%~30%，公學校六年級考上的只有 10%左右。」<sup>68</sup> 又筆者整理日治時期升學臺北工業學校畢業耆老們的回憶錄，發現有不少人是小公學校畢業後第一年未考上中等學校，因此再讀公學校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sup>69</sup> 筆者共整理 26 位，其中

<sup>68</sup> 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 年 12 月），頁 35。

<sup>69</sup> 例如高明輝先生讀完樹林公學校後，再念兩年高等科，才考上「臺北工業學校」；李廷河先生

老公公學校畢業後，續讀高等科一年級肄業，再考入工業學校；王禮忠先生太平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才考入工業學校；林錦衣先生朱厝崙公學校畢業後，曾念過一年的末廣小學校高等科，再考取工業學校機械科；陳登財先生日新公學校畢業後，再讀一年高等科，才考上工業學校應化科；陳海清先生朱厝崙公學校畢業後，續讀永樂公學校高等科，高等科二年級再考上工業學校應化科；黃永德先生從壽小學校畢業後，進入末廣高等小學校就讀，一年後肄業，考進臺北工業學校電氣科；林群英先生日新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就讀，再考進工業學校；張柄桐先生就讀朴子公學校，畢業後再讀兩年高等科，才考上工業學校；李宗廉先生公

臺籍學生 25 位，計有 14 位有就讀公學校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經驗，再考入工業學校，比例上幾近六成。若對照王世慶先生的訪談資料，雖然考上臺北第二中學的學生，高等科一年級肄業並沒有高達 60%，高等科二年級畢業生比例也未占 25%~30%，但從學校一覽及口訪回憶錄，可證實公學校高等科作為升學上級學校的補習教育，類似今日的重考班，然而學生仍有學籍與學生身分。

高等科除了是臺籍學生主要的升學管道，對於欲升學中等學校學生而言，具有再一次機會的意義，同時緩衝公學校畢業未升學中等學校者即將失業的情形。例如 1928 年出生的賴淳義先生（1941 年考上工業學校建築科）便說到：「進『臺北工業學校』讀書的，除了國小畢業外，如果國小畢業沒有考上，有的會去讀高等科二年制，就讀高等科一、二年，再沒考上就沒得讀了。」<sup>70</sup> 1937 年考取臺北工業學校電氣科的張炳桐，公學校畢業後，第一年落榜，高等科一年級時又落榜，高等科二年級畢業要去考試前，他的養父說：「如果沒考上，不是我不讓你讀，是你跟它無緣。」第三次他考上了。<sup>71</sup>

### 三、升學者的區域分布與家庭狀況：以二中及三高女為例

瞭解公學校高等科或高等小學校對台籍學生的意義後，筆者欲再探討以臺籍學生為主的北二中與三高女，究竟就讀臺北二中及三高女的學生，其出生地分布與家庭狀況為何？

#### （一）區域分布

依據臺北二中學校一覽製成 1933 年至 1941 年臺北二中學生出生地方表(表 3-6)，將學生籍貫分為臺北州與州外，臺北州又再分為市內跟市外，表 3-7 為三高女學生出生地方別，分為臺北州跟其他州廳。觀察兩表可看出，不論臺北二中或三高女，跨區就讀學生，即所謂臺北州外學生占學生數的 10%，臺北二中近九成學生籍貫分布臺北州，三高女約八成學生籍貫分布臺北州。再看表 3-6，二中

---

學校畢業後，第一次沒考上工業學校，因此進入日新公學校高等科就讀，兩年後再考上工業學校；陳萬金先生太平公學校畢業後先讀高等科，至高等科二年級才考上臺北工業學校；郭茂林先生太平公學校畢業第一年未考上中等學校，再讀一年高等科後考上工業學校。許東明先生自龍山公學校畢業後在老松公學校修習高等科一年，再考上工業學校。廖修鐘先生朱厝崙公學校畢業，當年未考上工業學校，在讀老松公學校高等科，高等科一年級考上工業學校。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2、24、32、89、98、106~107、115、125、139、166、219~220。

<sup>70</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203。

<sup>71</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139~140。

臺籍學生來自市內者約占五成至六成，1940年後臺北市出身的學生達70%，由此可知雖有跨區就讀學生，實際上就學學生仍以臺北市為主。

表 3-6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出身地方

	臺北州				州外		計	
	市內		市外		內	臺	內	臺
	內	臺	內	臺				
1933	24	40	2	28	0	11	26	79
1934	37	84	6	19	0	8	43	111
1935	31	71	9	24	6	13	46	108
1936	38	60	7	32	2	14	47	106
1937	46	61	6	29	0	13	53	103
1938	35	70	4	35	3	5	42	110
1939	43	56	5	40	1	7	49	103
1940	43	78	4	27	0	4	47	109
1941	46	78	0	26	0	5	46	109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一覽》1933~1941年。

表 3-7 臺北州立第三女學生（一年級）出身地方

	臺北州	其他州廳	計
1925	126	17	143
1927	125	22	147
1928	130	22	152
1929	121	32	153
1930	129	26	155
1931	124	30	154
1932	127	28	155
1933	126	30	156
1934	142	9	151
1935	134	22	156
1936	128	29	157
1939	178	30	208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年、1927至1939年。

## (二) 家庭狀況

表 3-8 為臺北二中學生家長職業統計，分為農業、礦業、工業、商業、銀行會社、交通業、官公吏、公務自由業、醫師、軍人、土地出租、無業等職業。其中 1933 年學校一覽職業分類有交通業、公務自由業與家事，1934 年後沒有交通業、公務自由業、家事，改為銀行會社、官公吏，並新增軍人；1937 年軍人職業消失，改為醫師，家事改為土地租賃業，至 1941 皆沿用醫師及土地租賃業。從表 3-8 可知二中學生家長職業以商業、銀行會社、官公吏為主，1937 年出現土地租賃業後，也佔家長職業總數的一成。從家長的職業分布與臺北地區人口職業結構頗類似。再看到表 3-9 三高女家長職業別，呈現商業及公務自由業為主，分別占 35%與 30%，1925 至 1930 從事農業者也不少，至 1931 年銳減，或許是因 1932 年後無業中再畫分為有收入及其他，無職業有收入者多為地主階級，依靠收租過活。工業與無業中有收入者約占 10%及 15%。可以說就讀二中及三高女學生，其家長多經商、在銀行、公司工作，或是公務人員。

表 3-8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學生(一年級)家長職業分布

	農業	礦業	工業	商業	交通業 (銀行會社)	公務自由 業(官公 吏)	軍人(醫 師)	家事(土 地租賃)	無業 (其他)	計
1933	3	5	7	39	4	31	0	5	11	105
1934	9	0	0	63	26	28	1(軍人)	0	27	154
1935	3	7	8	47	18	39	2(軍人)	1	29	154
1936	7	3	0	56	20	47	3(軍人)	0	17	153
1937	7	4	5	55	27	46	7(醫師)	2(土地 租賃)	3	156
1938	0	6	5	45	20	48	4(醫師)	22	2	152
1939	4	8	6	48	30	37	1(醫師)	17	1	152
1940	5	8	5	39	37	32	4(醫師)	14	12	156
1941	0	7	2	40	42	32	12 (醫師)	16	4	155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一覽》1933~1941

表 3-9 臺北州立第三高女學生（一年級）家長職業分布

	農業	礦業	工業	商業	交通業	公務自由業	其他職業	無業		計
								有收入	其他	
1925	27	--	15	51	--	36	14	--	--	143
1927	13	--	25	49	--	34	26	--	--	147
1928	19	3	11	56	4	31	1	27		152
1929	14	0	18	60	4	37	1	19		153
1930	14	3	17	54	8	39	2	18		155
1931	5	2	25	58	4	39	3	18		154
1932	8	3	18	46	8	46	1	22	3	155
1933	8	4	17	45	3	47	3	23	7	156
1934	7	5	15	44	3	46	3	25	3	151
1935	4	2	18	51	4	48	1	27	1	156
1936	8	3	11	55	3	56	0	21	0	157
1939	6	4	15	86	4	57	0	36	0	208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年、1927至1939年

表 3-10 臺北州立第三高女學生（一年級）本島人家長資產

	0~999	1000~4999	5000~9999	10000~49999	50000~99999	100000~299999	300000~499999	500000以上	總計
1925	9	27	22	44	6	11	1	1	121
1927	3	17	20	36	12	12	1	1	102
1928	1	19	25	47	16	13	1	4	126
1929	0	7	17	77	16	11	2	1	131
1930	1	10	14	63	20	7	1	0	116
1931	1	2	14	68	17	4	3	1	110
1932	0	12	22	59	15	6	1	3	118
1933	0	15	23	46	14	15	3	0	116
1934	1	8	25	48	24	8	3	3	120
1935	0	2	28	63	26	11	0	0	130
1936	1	1	15	74	29	19	1	4	144
1939	0	5	26	90	35	26	3	5	190

資料來源：《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年、1927至1939年

最後，筆者再從三高女本島人家長資產分析就讀中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依據 1937 年的《家計調查報告》，本島人每戶平均月收入為 137 圓 33 錢，(總收入)，臺北市每戶平均月收入 135 圓 61 錢 (總收入)，<sup>72</sup> 也就是說本島人每戶平均年所得約 1647 圓 96 錢，臺北市每戶平均年所得約 1627 圓 32 錢。對照表 3-10，三高女家長們資產最多座落在一萬圓以上五萬圓以下，遠超過平均值，可見得能夠入學女學校學生家庭資產額頗高，非一般家庭。雖說接受新式教育並非富有人家的特權，然而若要再支持學童中等學校就讀四年，乃至升學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甚至臺北帝國大學，若沒有多餘「閒錢」，便難以支持學生完成學業。

## 第二節 升學的決定

上節探討了臺北地區公學校學童畢業後的出路，主要升學管道為就讀高等科，並分析高等科對於臺籍學生的重要性，以及怎樣家庭背景或家長職業較能支持學童升學，本節將就現有的口述訪談與回憶錄出版品，共計男性 31 名，女性 12 名，就客觀環境因素與學童想法，分別探討男女學童為何選擇升學，如何決定升學管道。

### 一、客觀環境

前述得知升學與否最重要考量乃經濟因素，筆者將之歸類為客觀環境因素，除了個人家境因素外，師長的期許，乃至大環境社會風氣以及觀念皆具有相當影響力，以下分述之，

#### (一) 社會風氣與觀念

劉枝萬出生於 1923 年 12 月，1930 年入埔里公學校就讀，他指出當時社會人民生活普遍窮困，許多家庭甚至不讓孩子讀書，寧讓他們留家分擔家務……如果以性別比例來看，女生的就學率更低，因為臺灣社會普遍重男輕女，認為女孩子終要出嫁，讀書是無用之事。當時公學校男女合班，男女學生的比例約在三比一左右，這是就入學者而言，失學的女孩勢必更多。<sup>73</sup>

1927 年考取臺北工業學校的高玉樹，回憶起當時的升學情形，若有幸能夠就學者，也需經歷升學的窄門，考「大學校」，所謂大學就是指一中、二中、商

<sup>72</sup> 台灣總督官房企劃部，《家計調查報告》，1937 年至 1938 年，頁 304、316。

<sup>73</sup> 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8 年），頁 24-25。

業、工業四所五年制的州立中等學校，高一級的是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此外，還有臺北農林專門學校，及臺北醫科專門學校等，台灣大學當時還沒有成立。要擠進那些學校，是非常不容易的。<sup>74</sup> 從他的訪談回憶錄，可見 1927 年欲升學已相當競爭。

1918 年出生的施朝暉，在其口述史提到他的母親對他的期許：我阿母在讀書方面對我很嚴格，一直希望我能夠做醫生……幾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做醫生，第二的話就是做公學校的教員。<sup>75</sup> 1926 年出生三峽的郭逢時，7 歲喪父，畢業於大埔公學校，於 1938 年考上臺北工業學校，當時班上只有他一人考上工業學校，他在訪談時提到，當時社會有這樣的觀念，要不當醫師，或者當黑手，當黑手最有名的學校，就是讀「臺北工業學校」。<sup>76</sup>

總結上述說法，可知 1930 年代鄉村地區學童因家境緣故，無法就讀公學校，女子除家境因素外，受社會傳統觀念影響，重男輕女，也認為女子將來出嫁，不須受太多教育。男子若要升學，有師範學校、中學校、商業、工業學校，通常考中學校，將來一定要再考專門學校或大學，如此需要一筆學費，多讀這幾年書的學費；<sup>77</sup> 至於師範學校，商業、工業學校畢業後，通常有一技之長，可投入職場，尤其師範學校畢業後當公學校教員，其薪水或社會地位皆不錯。

## （二） 男子為何選擇升學

影響學童選擇升學何種學校，除受到家庭經濟力影響，家長或老師的意見也具有相當影響力。表 3-11 為筆者就現有回憶錄中升學者，歸納他們的背景，升學相關原因。以下簡略敘述：

施朝暉（史明）1918 年出生於臺北士林，父親林濟川，畢業於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為日治時期文化協會成員之一，母親的家族在士林算是望族，母親嫁給他父親時，祖母拿了五千圓給他母親當嫁妝，這筆錢在當時相當大，可見他的家境相當好。史明八歲時（1926 年）就讀士林公學校，在二年級時轉學到建成小學校。轉學的原因是因為他母親要他讀好學校，將來才可以當醫生。小學校的學生程度比較好，畢業以後如果想進中等學校、醫專就學的可能性也比較高。後

<sup>74</sup> 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市：前衛，2007 年），頁 10。

<sup>75</sup>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3 年 1 月），頁 36。

<sup>76</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186~189。

<sup>77</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158。



來要考臺北一中時，史明的父母請了一位很有名的記者許炎亭當他的家庭教師。一個禮拜去許炎亭家上兩、三次課，主要學的是日文和算術。在如此情形下，史明第一年就考上了臺北一中。<sup>78</sup>

高玉樹先生 1927 年公學校畢業，時值總督府興建臺灣最大的水力發電廠—日月潭發電廠。他的老師尾豐三郎勸他立志做一個電氣工程師，以考取當時最難考的臺北工業學校電氣工程科為目標，對他多加鼓勵。他因此認為今後台灣社會的繁榮基礎，就在電力的供應，遂聽從老師的教誨，全力以赴，最終如願以償，考入臺北工業學校電器工程科。<sup>79</sup>

1925 年考入臺北二中的劉盛烈，1930 年畢業後，欲去日本就讀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因遠離家鄉，費用可觀，他的父親沒有能力送他去日本讀書，劉盛烈只好放棄留日。隔年考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sup>80</sup>

黃伯超先生深受父親影響，由於父親為醫學博士，瞭解學歷與成就之間的關連，所以希望他能夠像自己一樣，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最理想的情形，就是進入臺北高校尋常科。因此黃伯超報名了臺北高校尋常科入學考試，1939 年不負父親所望考上臺北高校。<sup>81</sup>

許遠東先生龍山公學校畢業後，由於家境不算好，他又是長子，通常去做學徒，開始賺錢養家，然而他父親不希望許遠東走他當初的路，認為讀書才有前途，因此再苦也要讓他去考中學。<sup>82</sup>

王世慶先生沙崙公學校重讀一年（1940）準備升學，當時六年級老師李明以就業考量，勸他考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他也聽從老師的話報考，於 1941 年順利考取。<sup>83</sup>

高明輝先生 1927 年樹林公學校畢業後，再念兩年高等科。因為家庭環境不好，沒有考中學，而是考師範學校以及「臺北工業學校」，考了三年，師範學校沒考上，考上「臺北工業學校」。……因為父親在工廠工作，所以選擇了工業方面的學校。陳榮周先生報考臺北工業學校，是因大哥本身畢業於工業講習所，建議

<sup>78</sup>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 42-45。

<sup>79</sup> 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頁 10-11。

<sup>80</sup> 林忠勝編著，《劉盛烈回憶錄》，頁 31。

<sup>81</sup> 黃伯超口述，蔡錦堂主訪，徐聖凱撰著，《黃伯超先生傳：臺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本土醫學教育改革先驅》（臺北市：前衛，2012 年 5 月），頁 48-49。

<sup>82</sup> 許秋暘、盧世祥著，《臺灣紳士許遠東》（臺北市：允晨文化，2010 年 10 月），頁 40。

<sup>83</sup> 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頁 35。

他讀「臺北工業學校」，未來較有出路，所以他才報考。王禮忠先生考上臺北工業學校時，父親擔心無法負擔他學費，卻因父親老闆勸說：「臺北工業考得上就要讀」，才去就讀。林永倉先生原想讀醫科，但讀醫科要花很多錢，家中不是很有錢，父親希望他能趕緊賺錢幫忙家計，因此去讀工業學校。周塗墩父親做工作農，家裡很窮，父親希望他能找一個畢業後馬上有職業的學校，因此他先報考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沒有考取，再去考「臺北工業學校」電氣科。<sup>84</sup> 此外，陳登海、陳海清、李宗廉、陳景仁、林書鴻等人也是受父親或哥哥鼓勵因而報考，可參照表 3-11。

升學的選擇也與家庭經濟力或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有關。在這些個案中的賴淳義先生，原本家境良好，家人也期許他讀醫，然而小學六年級時父親過世，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為了畢業後可以賺錢養家，他報考臺北工業學校。<sup>85</sup> 王世慶先生報考桃園農業學校，也有出於就業考量。周塗墩、郭茂林先生也有因經濟考量報考臺北工業學校。

在這些個案中，許遠東及陳海清，家境皆不好，許遠東父親臺中一中肄業，陳海清父親則未受過正式教育，或許因為如此，他們更堅持要讓小孩升學，希望讓小孩多念點書，完成中等學校學歷。

### （三） 女子為何選擇升學

至於女子的就學與不就學，根據山本禮子對於臺灣高等女學校的研究，以問卷調查日治時期就讀高女學生們的入學動機，分為：自我意志、親人鼓勵、教師鼓勵、兄弟姊妹的鼓勵、官吏鼓勵、其他。問卷回答可以複選，最後結果為自我意志占 82.7%，親人鼓勵約占 40%，教師鼓勵占 20%。<sup>86</sup> 筆者再就游鑑明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記錄》中的訪談記錄，楊千鶴自傳性回憶錄《人生的三稜鏡》，製成表 3-12。

參照表 3-12，能夠升學者如丘鴛鴦、林蔡素女、陳石滿、林蔡婉、陳愛珠，丘鴛鴦、林蔡素女皆認為是父母沒有重男輕女觀念，甚至父親鼓勵讀書。陳石滿出身於宜蘭名望家族，父親頗開明，母親則觀念保守，然而由於父親早逝，母親在分家產過程中被騙，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有很大轉變，下決心要讓子女讀書識

<sup>84</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2、11、32-33、46、64。

<sup>85</sup> 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202。

<sup>86</sup>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 高等女 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 年），頁 116~117。

字。林蔡婉及陳愛珠則是父親同意，才得以升學。楊千鶴則受到老師影響，尹喜妹公學校畢業後未繼續升學。

相較於男子，女子更不容易升學，例如尹喜妹女士提到：因為家裡沒有多餘的錢，我又是女孩子，所以父母從來沒有考慮過我的教育問題，我能上學還是靠大哥幫忙的。我十歲那年，他考上代用教員，回來問我母親為什麼不讓我念書，母親也搞不清情形，就說甚麼時候可以去就讓我去，結果大哥說明天就帶我去，母親答應，我才開始上學。<sup>87</sup> 女子從公學校時期就不一定能就讀，公學校畢業後的升學更加不易。與男子相比，女性就學的順位低於男性，而能夠升學家庭，家長或受過近代教育，或者職業上從商，或是父親為街庄長，要作為地方表率，故讓小孩受新式教育。

表 3-11 臺籍男學生學籍概況分析表

姓名	生年	出生地	親屬職業	親屬教育程度	就讀小公學校	是否有讀高等科	公學校畢業年/升學年	升學學校	為何選擇升學	如何選擇升學
劉盛烈	1912	南港	父：礦業	父：漢學	南港公學校	無	1925/1925	臺北二中	自我意願	師長建議
高玉樹	1913	松山			松山公學校→太平公學校	無	1927/1927	臺北工業學校	師長建議	師長建議
史明	1918	士林	父：文協會員		士林公學校→建成小學校	無	1933/1933	臺北一中	父母決定/自我意願	父母決定
曹永和	1920	士林	父：銀行行員	父：國語學校畢	士林公學校→太平公學校	有(末廣高等小學校)	1933/1934	臺北二中	父母決定	師長建議
王萬居	1925	台北	父：花店	父：無就學	日新公學校	有(日新公學校高等)	1938/1939	臺北二中	師長建議	師長建議

<sup>87</sup>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訪問記錄》（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13。

						科)				
許遠東	1927	艋舺	父：開 公車	父：台 中一中 輟學	龍山公 學校	無		臺北二 中	父母決 定/自我 意願	自我意 願
王世慶	1928	板橋			沙崙公 學校	無	1940/1941	桃園農 業學校	師長建 議	師長建 議
高明輝	1915	樹林	父：樹 林酒工 廠		樹林公 學校	有(樹林公 學校高等 科)	1928/1930	臺北工 業學校	父母決 定	父母決 定(經濟 因素)
陳榮周	1917	臺北 市	父：經 米所	漢學	臺北第 一師範 學校附 屬公學 校	無	1930/1930	臺北工 業學校	師長建 議(大 哥)	師長建 議(大 哥)
李廷河	1920	臺北 市			老松公 學校	有(老松公 學校)	1932/1933	臺北工 業學校	不明	
王禮忠	1918	臺北 市	父：僱 員		太平公 學校	有	1933/1935	臺北工 業學校	父母決 定/師長 建議	自我意 願
周塗墩	1921	臺北 市	父：樟 腦工人	無就學	臺北第 一師範 學校附 屬公學 校	無	1934/1934	臺北工 業學校	父母決 定	父母決 定(經濟 因素)
林錦衣	1921	臺北 市	父：商 人，大 安區區 長	漢學	朱厝崙 公學校	有(末廣小 學校高等 科)	1933/1934	臺北工 業學校	自我意 願	自我意 願
陳登財	1921	大稻 埕	養父： 開店		日新公 學校	有(日新公 學校高等 科)	1934/1935	臺北工 業學校	父母決 定(養 父)	父母決 定(養 父)
陳海清	1921	三重	父：酒 廠工人	未受教 育	朱厝崙 公學校	有(永樂公 學校高等 科)	1933/1935	臺北工 業學校	父母決 定	父母決 定

黃永德	1922		父：會社專務		老松公學校→壽小學校	有(莫廣高等小學校)	1934/1935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	師長建議 自我意願
林群英	1923	臺北市	父(林有土)：書記		日新公學校	有(末廣高等小學校)	1935/1936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	自我意願 師長因素
蘇明義	1926	臺北	父：巡查部長			無	1939/1943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	自我意願
李宗廉	1926		父：曾任職「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新竹第一公學校→日新公學校	有(日新公學校高等科)	1938/1939	臺北工業學校	師長建議(大哥)	師長建議
陳景仁	1927	臺北	父：交通運輸		壽尋常小學校	無	1940/1940	臺北工業學校	父母決定	父母決定
郭逢時	1926	三峽	父：教師	父：台北師範學校講習科	大埔公學校	無	1939/1939	臺北工業學校	師長建議	師長建議
賴淳義	1928	臺北市	父：支店店長		樺山小學校	無	1941/1941	臺北工業學校	父母決定 自我意願	父母決定(經濟因素)
陳萬金	1927	五股	父：地主		太平公學校	有(太平公學校)	1940/1941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	自我意願(報國理想)
郭茂林	1921	臺北市	父：茶行經理		太平公學校	有(太平公學校高等科)	1934/1935	臺北工業學校	父母決定(經濟因素)	自我意願 父母決定(經濟因素)

許東明	1926	臺北市			龍山公學校	有(老松公學校高等科)	1938/1939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	自我意願(為了美名)
林書鴻	1928	土城				無	1941/1941	臺北工業學校	師長建議	師長建議
廖修鐘	1929		父：營建業		朱厝崙公學校	有(老松公學校高等科)	1942/1944	臺北工業學校	自我意願(父親從事營建業)	自我意願(父親從事營建業)
賴適存	1930		父：教師		宮前國民學校	有(日新國民學校高等科)	1943/1946	臺北工業學校	師長建議(指定報考臺北二中,落榜)	師長建議(指定報考臺北二中,落榜)

資料來源：《劉盛烈回憶錄》、《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臺灣紳士許遠東》、《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黃伯超先生傳：臺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本土醫學教育改革先驅》、《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二)》

表 3-12 臺籍女學生學籍概況分析表

姓名	生年	出生地	親屬職業	親屬教育程度	就讀小公學校	是否有讀高等科	公學校畢業年/升學年	升學學校	為何升學	如何選擇升學
丘鴛鴦	1902	嘉義			朴子公學校	無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父母決定	父母決定
林蔡素女	1903		父：慶昌商行店主	父：國語學校畢業	北港公學校	無		臺北第三高女	父母決定自我意願	父母決定自我意願
陳石滿	1908	宜蘭	父：早逝 母：家管		宜蘭女子公學校	無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父母決定自我意願	父母決定自我意願
林蔡婉	1910	臺北			鳳山公	無		臺北第三	父母決	父母決

					學校			高女	定	定
尹喜妹	1913	桃園			楊梅公學校	無		無升學	師長建議(大哥)	師長建議(大哥)
陳愛珠	1914	宜蘭	父：庄長		羅東女子公學校	有		臺北第三高女	父母決定	父母決定
楊千鶴	1921	臺北市	父：營建業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無		私立靜修女學校	師長建議	師長建議

資料來源：《走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訪問記錄》、《人生的三棱鏡》

## 二、主觀意識：學童的想法

儘管家長或老師對於學童升學與否具有重要影響力，筆者想問學童對於升學或是追求更高等教育這件事的看法為何？對於客觀環境，是否全盤接受師長安排？或是有自己的想法。

史明自建成小學校畢業後，考上臺北一中，家人都很開心，他自己心裡也很高興，他認為這是他的一種虛榮心。<sup>88</sup> 曹永和先生提到自己念二中時，母親希望他能念醫科，然而他自己並沒有很想就讀，反而對教書有些嚮往。然而母親認為，為了前途著想，他應該當醫師，當了醫生自然有錢進門。為了逃避這樣的家庭氣氛，他常去借住二中學弟林朝陽家。<sup>89</sup> 前述許遠東先生，幼時家境不好，然而父親希望他能有所出息，再苦也要讓他讀書，他自己也一心好學，想繼續升學。

而上述就讀過臺北工業學校的受訪者，陳萬金先生認為考取臺北工業學校是他的理想，也可證實他是相當優秀的畢業生。郭茂林先生雖然就讀臺北工業學校然而他心裡希望能依循中學、高中、大學的模式升學，然而自己深知家中經濟狀況，無法向家人開口要求。黃永德先生則是想報考臺北高校尋常科，但因為高等小學校長不願意寫內申書（推薦信），最終轉考臺北工業學校。

尹喜妹公學校畢業後，不用經過考試直升學校附設的農業專修學校，但因家

<sup>88</sup>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一：穿越紅潮》，頁 42。

<sup>89</sup>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頁 33。

中經濟狀況只讀半年。就讀專修學校時，我一直希望畢業後能進新竹高等女學校，下課後就和其他準備升學的同學一起留下來接受課業輔導。可是我父親表示沒有辦法供我繼續念書，我哭了，然而哭也沒有用，事實上我也瞭解家裡的經濟狀況，能讓我念專修學校已經很不容易了。<sup>90</sup>

就讀三高女的林蔡素女公學校時便立下志向就讀三高女，乃是因為她的姐姐蔡亦好也就讀三高女，每次過年或暑假返家，媽媽都為她殺激進補，在林蔡素女幼小的心靈裡充滿忌妒和羨慕，在不服輸、不甘心的心理作祟下，我矢志就讀第三高女。陳石滿女士則是因為出身大家族，父親早逝，她自幼與寡母備嘗人情冷暖，因此心裡暗暗立志將來一定要認真讀書，好出人頭地，同時也讓她母親揚眉吐氣。<sup>91</sup>

礙於資料限制，本節只能就部分人士經驗稍稍印證學童的自主意識。總言之，升學與否家長具有重要決策權，囿於經濟力或傳統價值觀，可以說從家族戰略角度，男子升學優於女性，至少從經濟生產力角度來看，此時期男子升學就業機會遠多於女性，女子升學管道少，升學後，能夠選擇的職業不多。從 1930 年代公學校畢業生出路來看，主要仍是畢業後就業，而男子升學者比率的增加，或可視為升學是為追求更好待遇或更穩定工作，同時女子公學校畢業生就業人口也逐年增加，升學人口也緩慢增加，女性投入勞動市場，與升學人口的提升，或可顯示社會變遷與價值觀的改變。

至於影響學童升學選擇的原因，家長或老師具有相當影響力，不過學童也並非全然被動，他們努力的動機與過程，不應忽視。特別是女子在面對無法升學的情形，反倒展現出主動的一面。並且根據三高女家長資產與職業調查，對照表 3-12 口訪回憶錄中升學三高女學生的親屬職業，能夠升學女學校除課業表現傑出，親屬多是地方頭人、商店主或富農階層，才能供應女學生就學。此外，男女學童升學的決定具有相當差異。男子受父母、師長影響大，女子則較為自己想升學。從回憶錄及口述訪談等資料，這些升學的學童多是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與待遇，或是未來。有升學者就有落榜者，幸運的是他們成功通過升學窄門，拿到門票。筆者認為他們正是許多欲升學者及師長的縮影，代表著 1930 年代升學風潮。

---

<sup>90</sup>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訪問記錄》，頁 16。

<sup>91</sup>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訪問記錄》，頁 125、220~222。



## 第四章 民間的中等教育擴張訴求

本章所要處理的是，面對升學機關的缺乏，臺北地區民眾如何要求，這些發起訴求不斷請願的人士，他們的背景為何？他們是如何要求到更多的教育資源？官方又是如何回應？中間折衝的過程？最後，這些教育訴求成功或失敗？也就是說，實際上 1930 年代臺北地區初等教育後的升學空間成長情形為何

筆者就私立臺北國民中學的設立以及三高女遷校兩個案，分析背後支持民眾的背景，從兩起教育擴張要求看臺北地區日人與臺人間，官方與民間互動的過程，並進一步探討地域、民族別、性別的差異。筆者欲借用藤井康子新舊中間層的概念，分析支持教育擴張人士的背景。<sup>92</sup> 這些人的身分、學歷或職業人脈是否為影響教育訴求成功的關鍵？臺北地區的中等教育訴求得以發展，這些日台籍民眾是如何爭取？如何聯繫？如何實踐？從而驗證民眾對於教育的主動性。

### 第一節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校」設立運動

#### 一、私立臺北國民中學設立申請

1933 至 1934 年，臺北地區民眾發起緩和入學難運動，其訴求為增設中學校，若不能增設中學實業學校也可，但最終官方以經費不足回絕，商工專修學校，中學校創立費皆被消除，僅以增加班級數緩和入學難。一般父兄大失所望。因此 1935 年 2 月，安田勝次郎、鈴木重嶽兩氏，計畫設立私立學校，經過討論，提出認可申請書，2 月 7、8 兩日安田與鈴木訪問督府及州當局，希望得到當局同意。設立請願書初版內容為：私立臺北國民中學校校舍擬借用成淵學校，豫科修業一年，收容人數四班二百名，本科修業年限五年，第一學年收容三班約一百五十名。<sup>93</sup> 凡小公學校畢業生，皆可申請入學，四月開校，學費一個月五圓，除八月夏休，一年共徵收五十五圓。<sup>94</sup> 在班級數上，野口敏治知事恐一至五年後，

<sup>92</sup> 藤井康子所謂的新中間層有四類：1.管理的職業，例如公司中的董事、局長或部長；2.專門的、技術的職業，例如教師或記者，醫師與律師這類自由業也包含在內；3.事務類，4.販賣。舊中間層則是指具有生產手段，即具有資本的自作農、商店主人或工廠主人等。

藤井康子，〈一九二〇年代台中等・高等教育地域社〉，(京都大學教育研究科教育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11。) ，頁 15-16。

<sup>93</sup> 〈官立出來 私立 入學難緩和「臺北國民中學」 認可申請〉，《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9 日，08，第 12521 號。

<sup>94</sup> 〈擬募集二學級 收容 臺人百餘名 四月間便可開校〉，《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3 月 10 日，n04，第 12550 號。

班級總數 15 班，學校空間不足以收容，諭令減為二班。

此次申請，當局核准與否，考量之一為資金。為此，市內日臺人有志者熱烈募款。安田、鈴木首先與河村本社長磋商，其後河村氏拜訪市內臺銀、電力、三井、三菱、大阪商船等重要職員勸募，個人捐款者有木村泰治、後宮信太郎、小宮元之助等人；大稻埕方面有郭廷俊、許智貴、張清港、楊漢龍等約 30 名，萬華約有 67 名捐款，總計約百名，每年每人贊助五十圓，百名共五千圓。<sup>95</sup> 由於民眾的熱烈捐募，迅速達到資金門檻。3 月 20 日，安田、鈴木兩人再提出設立請願，然而當局又因學校職員薪水問題，尚未通過許可。安田、鈴木兩人再拜訪州當局，並作修正。<sup>96</sup> 最終設立請願書內容如下：

最近小公學校畢業人數大增，自願升學中等學校者亦顯著增加，然而我們臺北市卻只有兩所州立中學校，以及各一所商業及工業學校，就算各校收容學生二百名，總數也不超過八百名，若再加上私立臺灣商工學校所能收容的學生總數約一千名左右。如此僅是欲接受中等教育者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不僅僅使三十萬市民的子弟們陷入極端入學難，更阻礙了他們的向學心，或使他們的家庭發生不幸的事態等，令人無法漠視。因此去年以來市民中有志人士推動中學校增設運動，然卻因財政及其他理由而無法達成，實在不勝遺憾。有鑑於如此情勢，設立私立台北國民中學，以彌補教育機關的缺陷，緩和入學難，為當務之急。吾等願盡微薄之力，達成目的之貫徹，學生之募集及其他等，懇請各位市民給予援助。<sup>97</sup>

1935 年 4 月 20 日，私立台北國民中學設立認可，借台北市大和町二丁目的成淵學校校舍上課，生徒一年二班 120 名，志願書繳交期限四月三十日，入學試驗 5 月 3、4 日舉行，科目為國語、算術、國史、口頭試問。<sup>98</sup> 第一年招生募集人員 120 名，志願者多至 300 餘名，4 日入學考試結束，5 日公布成績，10 號舉行開學典禮。<sup>99</sup>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設立可說是台北市民有志者熱烈努力的成

<sup>95</sup>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 網羅內臺人為贊助員 近日將提出設立願書〉，《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3 月 10 日，n04，第 12550 號。

<sup>96</sup>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雇用教員四名，每名教員平均月薪八十圓，當局認為其薪水過少，因而未核准許可。〈私立臺北國民中學 網羅內臺人為贊助員 近日將提出設立願書〉，《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3 月 26 日，n04，第 12566 號。

<sup>97</sup>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設立趣意書〉，《第一教育》，第 14 卷第 3 號，（1935 年 4 月），頁 107-108。

<sup>98</sup> 〈臺北國民中學 設立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1 日，11，第 12591 號。

<sup>99</sup> 〈國民中學 受驗多三倍 十日入學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5 月 5 日，08，第 12605 號。

果。隔年國民中學欲建新校舍，須募集資金十萬圓，<sup>100</sup> 對於如此高額經費，校方向學生父兄勸募學校新營工費，每名募款三十圓以上，然主動捐款者不少，約得一萬圓。又得臺北州補助六千，督府及台北市政府各補助二千圓，共得官廳補助一萬圓，連續三年共三萬圓，父兄也累計三萬圓，其他由一般募集，終於募集十萬圓基金。<sup>101</sup> 至 1939 年 3 月 16 日，國民中學新校舍才將完工，<sup>102</sup> 佔地七千坪，5 月 20 日舉行校舍移轉式，國民中學從成淵學校移轉至台北市大龍峒。<sup>103</sup>

## 二、 支持私立臺北國民中學的有力者

### (一)常設學務委員

前述緩和入學難運動以至私立臺北國民中學申請認可，這一連串的請願活動首由學務委員發起，與家長會長們開會討論入學難問題，隨後組成實行委員，不斷向臺北州知事、甚至是督府官員、總督陳情教育訴求。所謂常設學務委員，依據過去研究，市可於州知事認可下設置常設委員，委員為名譽職，任期兩年，由市尹就該地域內之住民進行任命。依據大正 10 年(1921)「臺北市常設委員規程」，分為學務、勸業、衛生、土木、社會事業，以及財務調查等常設委員。日治時期常設委員在市議會無議決功能，然而常設委員可於議會場合進行市政事務報告，為市政施行的重要參考依據。<sup>104</sup> 也就是說，常設學務委員雖為名譽職，於議會無議決功能，但他們能夠反應地方民意，官方也相當重視，並為施政參考來源。且最初發起請願運動的日籍學務委員與家長會長，他們有的還具有州市協議會員的雙重身分。

### (二)協議會員

表 4-1 為筆者根據報紙報導，對照總督府職員錄及人士鑑，整理出參與緩和入學難運動及私立國民中學設立的日臺籍有力人士。具有督府評議員或州市協議會員身分的日籍有力人士有：谷口巖、小松吉久、安田勝次郎、大栗巖、銀屋慶

<sup>100</sup> 〈國民中學募十萬圓 買收地址新建校舍 新年度又增教員四名〉，《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4 月 8 日，08，第 12941 號。

<sup>101</sup> 〈國民中學 募集基金 父兄約一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2 月 3 日，08，第 13240 號。

<sup>102</sup> 〈國民中學 校舍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16 日，07，第 14007 號。

<sup>103</sup> 〈國民中學 新校舍 修葺式 行〉，《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5 月 21 日，n02，第 14072 號。

<sup>104</sup> 賴文清，〈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頁 184-185。

之助、中辻喜次郎、鈴木重嶽、大澤貞吉、木村泰治、後宮信太郎、小宮元之助、鼓包美。具有州市協議會員或督府評議員身分的臺籍有力人士有：張清港、蔡彬淮、郭廷俊、陳振能、楊漢龍。

日籍協議會員，除小松吉久接受漢學，其餘日籍人士皆受過近代新式教育。職業方面多數為公司企業董事的管理職或記者、醫師、律師等專門的、技術的職業。例如，管理職業者有小松吉久、銀屋慶之助、中辻喜次郎、木村泰治、後宮信太郎；專門、技術職業者有谷口巖（醫師）、安田勝次郎（律師）、大栗巖（醫師）、大澤貞吉（記者）、小宮元之助（律師）、鼓包美（律師）；販賣者有富田榮太郎（機械販賣）、鈴木重嶽（貿易商）。簡言之，支持教育訴求的日籍協議會員多為受過新式教育的新中間層，年齡層分布 1860、1870、1880 各年代。

臺籍協議會員除楊漢龍為農事試驗場畢業，其餘為國語傳習所或國語學校畢業，他們皆受過近代教育。職業上為各信用組合組合長、幹事或公司董事，除蔡彬淮 1877 年出生，其餘皆為 1880 年後出生（陳振能 1891 年），至 1934 年年齡接近五十歲。臺籍協議會員的學歷與職業皆相當類似，屬於新中間層，然而其中郭廷俊、張清港、楊漢龍皆參加稻江信用組合，楊彬淮則參加艋舺信用組合。前述私立國民中學的募款，經費來源可分為三部份，一為市內日系大公司重要職員勸募，一為大稻埕方面有力者（30 名）勸募，一為萬華方面（67 名）募款。

表 4-1 緩和入學難運動參與人士（1934 年）

姓名	生年	出身	學歷	來臺	職業(1934)	產業組合（1933）
谷口巖	1873	佐賀	第五高醫學部	1899	臺北常設學務委員、臺北市協議會員、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醫院醫務囑託	
小松吉久	1867	東京	私塾	1896	臺北常設學務委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日本拓植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社團法人臺灣業會長	溫故信用組合
安田勝次郎	1866	奈良	東京法學院	1899	臺北常設學務委員、辯護士、臺北市協議會員	

大栗巖		德島	九州帝國大學	1916	臺北常設學務委員、臺北市協議員、大栗病院長	
富田榮太郎	1872	鳥取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	1910	臺灣青物株式會社社長、機械販賣、八甲公會長	
尾崎秀真					臺北常設學務委員、記者	
銀屋慶之助	1875	鹿兒島	東京高商	1899	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信用組合長、新原金物店主	臺北信用組合
中喜次郎	1867	富山	東京專修學校	1895	臺北州協議會員、盛進商行代表取締役	臺北商工信用組合、台北共榮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
鈴木重嶽	1871	熊本	同志社大學	1896	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市表町貿易商	臺北庶民信用組合
大澤貞吉	1886	東京	東京帝國大學	1923	臺北市協議會員、臺灣日日新報新聞主筆	
木村泰治	1872	秋田	東京英語學校	1897	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社長、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臺北商工信用組合、台北共榮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
後宮信太郎	1873	京都	同志社大學	1895	諸會社重役、總督府評議會員	臺北商工信用組合、台北共榮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
小宮元之助	1866	長崎	明治大學	1895	辯護士、臺北州協議會員	臺北庶民信用組合
包美	1882	東京	東京帝國大學	1917	臺北州協議會員、大稻埕公會長、辯護士	
蔡彬淮	1877	萬華	漢學、國語練習		臺北州協議會員、艋舺信用組合幹事	艋舺信用組合、臺北庶民信用組

			所			合
郭廷俊	1882	臺北	國語學校 國語部		總督府評議會員、稻江信用組合長、臺灣米庫利用組合長	稻江信用組合、臺北庶民信用組合、永樂町店鋪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台灣米庫利用販賣購買組合
許智貴	1885	臺北	國語傳習所		臺北市協議會員、聯發株式會社取締役	稻江信用組合、永樂町店鋪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
張清港	1886	臺北	國語學校		臺北州協議會員、稻江信用組合專務理事	稻江信用組合、永樂町店鋪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台灣米庫利用販賣購買組合
楊漢龍	1887	臺北	農事試驗場		臺北市協議會員	稻江信用組合
陳振能	1891	臺北	國語學校 師範部		朝日興業株式會社取締役、臺北市協議會員	城南信用組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32~1934)，《臺灣官紳年鑑》(1932、1934)，《臺灣人士鑑》(1937)，《臺灣紳士名鑑》(1937)，《臺北州下產業組合役職員錄》(1933)，《南國之人士》，《大眾人士錄—外地海外篇》

### (三) 支持基盤的人際網絡

私立國民中學的設立，最初為日籍常設學務委員及家長會長們針對入學難問題，自發開會討論，組成實行委員，試圖解決入學難問題，進而不斷向官方陳情請願，最終甚至有市民七八千人連署請願。這些學務委員或家長會長同時具有州、市協議會員身分，因而尋求同樣關注此問題的其餘協議會員們的支持，這群協議會員，日籍協議會員年齡層落在五六十歲左右，職業為企業主、律師、醫師、記者等新中間層。臺籍協議會員年齡層約五十歲，職業也多为管理層的新中間層。除了同為州市協議會員，某些協議會員參與相同的產業組合組織，例如，中

辻喜次郎、木村泰治、後宮信太郎都有加入臺北商工信用組合；郭廷俊、許智貴、張清港、楊漢龍都有加入稻江信用組合，由此可推測加入相同的產業組合，也是建立自我的人脈網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經費募集上，對臺籍人士分為大稻埕與萬華兩區勸募，可見 1930 年代，萬華與大稻埕的臺籍人士仍具有相當經濟力與影響力。

### 三、1930 年代男子中等教育的擴張

上述日台籍有力人士藉由私立國民中學的設立，希冀讓小公學校畢業生，獲得更多的中等教育就學機會。在日台籍有力人士的運作下，國民中學設立。1937 年總督府設立臺北第三中學以緩和入學難現象，以下分別敘述男子中等教育機關的增設情形，及真正就學者是否有地域性或民族別差異。

#### (一) 私立國民中學

1935 年 4 月 20 日，私立台北國民中學設立認可。該年招收學生為 120 名，報考者多至 300 餘名。<sup>105</sup> 錄取率約 40%，與其他中學相比錄取率相對高。又觀察表 4-4 內臺人錄取人數，設立第一年，錄取日籍學生 69 名，臺籍學生 51 名，人數相差並沒有太懸殊，之後每年臺人錄取數越來越高，日籍學生入學數則維持在 30 至 40 人左右。

表 4-2 私立國民中學學生數 單位：人

	入學許可數		在學生數	畢業者數
	內地人	臺灣人		
1935	69	51		
1936	65	57		
1937	25	95	314	
1938	30	95	419	
1939	42	75	496	31
1940	39	124		
1941	46	117		
1942			619	

<sup>105</sup>〈國民中學 受驗多三倍 十日入學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5 月 5 日，08，第 12605 號。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日治時期私立學校僅被視為「各種學校」，並非被承認為「私立中學校」，在藤井的研究中已指出當時就讀私校學生，由於學歷並非「私立中學校」，無法升學上級學校，故許多學生至第二、三年紛紛離校，最終畢業者不足一成也是常有之事。<sup>106</sup> 由於 1930 年代入學難問題，總督府文教局於 1938 年制定〈私立中等學校設立認可標準〉，私立學校可申請認可為私立中學校，由總督府文教局派員調查，在財團維持內容、教職員組織、學校設備、教育狀況均達到標準，便可設立認可。1939 年 6 月 21 日，私立國民中學、臺南長榮中學校、臺南長榮高等女學校、開南商業學校、開南工業學校皆認可為私立中學校。<sup>107</sup>

至 1937 私立國民中學在學生數為 314 人，1942 年增加至 619 人，由於資料關係，僅能得知 1939 年第一屆畢業生 31 人。<sup>108</sup> 畢業人數不到入學者的 30%。1939 年財團法人國民中學被認可為私立國民中學校後，制定學校學則，規定修業年限五年，以教授高等普通教育為目的，特別重視國民道德的養成。入學者需尋常小學校或修業年限六年的公學校畢業生，或具有同等以上學歷認可者。學則中特別規定入學或轉學生需出示兩名保證人，保證人中一名為行使親權者，另一名為居住於臺北市內，成年並有獨立生計能力者。<sup>109</sup> 此項學則的制定，或可推測私立國民學校希望招收居住於臺北地區的學生。

## （二）、臺北第三、四中學校的設立

1935 年臺北地區因財政困難無法新設中學校，臺北地區有志者，請願設立私立國民中學，並奔走募款，最終成功設立國民中學，可見此時期民眾對於中學校設立的熱誠與主動性，官方或許是感受到中學校增設的必要與急迫性，對於中學校入學難問題，做出些許回應。據報載，文教局對於逐年激化的中等學校入學難緩和及子弟就職難對策，計畫昭和十二年度（1937）增設州立中等學校。……現在各州以豫算乃至陳情之形式，向當局提出者，臺北州有宜蘭高女、私立中等

<sup>106</sup> 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知行成一教育目的・制度・背後支柱〉，頁 177-178。

<sup>107</sup> 〈五中等學校 認定 總督府 從來 方針 一擲 學童 窄 門 吉報〉，《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6 月 22 日，n02，第 14104 號。

<sup>108</sup> 〈國民中學校維持財團經費 對 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總督府公文類纂》，（1940 年 12 月 1 日），冊號 10872，文號 14，頁 496。

<sup>109</sup> 〈指令第六三九號臺北州財團法人私立國民中學校維持財團經費 對 州費補助 件認可〉，《總督府公文類纂》，（1940 年 1 月 1 日），冊號 10873，文號 16，頁 459-462。



學校的認定昇格等案件。<sup>110</sup> 來年十二年度豫算，經財務當局查定，開設臺北第三中學校。<sup>111</sup> 州會決議新設臺北第三中學，所需經費四十三萬二千圓，其中三十五萬圓分三年舉債借入，1937年12月借入21萬圓，1938借入7萬圓，1939借入7萬圓。從借入理由可清楚知道州當局設立臺北第三中學原因：

本州由於中等學校入學志願者年年激增，中學校入學愈加困難，有鑑於現況新設第三中學校，以圖普及強化中等教育。<sup>112</sup>

三中設立之初借用臺北一中的教室上課，第一年招收150學生，然而當年印行兩千份報考說明書，一天內被索取剩不到三百份。共錄取新生150名，估計報名者達1450人，機率十分之一，依舊競爭激烈。若從設立後內臺人報考者數及入學數分析，入學名額多被內地人佔去，臺籍學生錄取率約20%左右，相較於日籍學生錄取率達50%，可說三中儼然成為日籍學生為主的中學校。1941年4月，臺北州立第四中學校新設，招生名額150名，報考人數內地人417，本島人1115，錄取名額內地人佔127，本島人佔29名。儘管新設公立中學校，臺籍學生錄取率依舊相當低。反觀日籍學生錄取率維持在40~50%。

表 4-3 第三中學報考者數、入學者數 單位：人

	入學志願者		入學者數		錄取率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37	226	56	134	12	59.3	21.4
1938	247	82	126	19	51.0	23.1
1939	376	7	217	4	57.7	57.1
1940	288	106	130	17	45.1	16.0
1941	333	122	136	24	40.8	19.7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

對照表 4-4、4-5，私立國民中學初期入學者日籍多於臺籍，然而越晚期臺籍學生數越多，臺北州立第三中學則以日籍學生為主，官方雖說第三中學增設為解

<sup>110</sup> 〈中等學校 數校 來年度 增設計畫 實業 育 考慮 加 文 當局 手 立案〉，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6月10日，07，第13004號。

<sup>111</sup> 〈文 局十二年度豫算 增設中等學校案通過 島 三校廈門一校計共四校〉，《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4日，n04，第13020號。

<sup>112</sup> 〈臺北州臺北第三中學校新營費資金借入 關 認可指令案〉，《總督府公文類纂》，（1937年10月1日），冊號10749，文號1，頁360。

決入學難，實際上官立中學校增設，入學者依舊是以日人為優先，解決的是日籍學生的入學難，臺籍學生升學依舊激烈，私立中學校成為臺籍學生升學中學的重要管道。

## 第二節、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遷校擴校運動

上節以國民中學設立來看日臺籍人士的協力過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直為臺籍女學生重要升學管道，本節將從三高女遷校案來看臺籍人士為中心的教育訴求，這些臺籍有力人士的背景與職業屬性，甚至主要運作人士分別代表哪些地域。最終回歸此時期的臺籍人士的教育訴求對於女子升學者的影響程度為何？

### 一、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遷校

三高女遷校案，最早在大正十四年（1925）小野正雄校長便提出遷校申請，然而每年州當局都置之不理。<sup>113</sup> 至 1932 年，部分家長有志者代表拜訪中瀨拙夫知事陳情遷校案。<sup>114</sup> 當時新校地地點討論許久，最初提議遷至三橋町葬儀堂附近，但遭到萬華地方家長反對，反對理由為新校地移至郊外，女學生通學跋涉太過辛苦，又三橋町附近為溫柔鄉，環境過於複雜。<sup>115</sup> 然而在督府官員及小野校長等人視察後，依舊決定遷校至三橋町，期間督府經費不足，甚至採用換地購地方式，賣方也同意，就待總督府通過。此次提案最終因主事官員卸任，不了了之。<sup>116</sup> 隔年大稻埕有力人士提議遷校至稻江，預定地為即將搬離現址的鐵道部所在地，不過鐵道部並未遷移至他處，此方案無法實現。關於新校地的選定，三高女的家長們意見不一，無法統合，最終因州當局經費缺乏，州知事的不贊同，遷校一事無法如願。<sup>117</sup> 然而三高女的學生家長與校方相關人士並未放棄，1933 年三高女創校 35 周年，學生家長們也藉此時機成立家長會，選出會長黃純青，副會

<sup>113</sup> 〈臺北三高女將移轉 市民望照舊處 移壽小學校而擴張之〉，《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18 日，04，第 11502 號。

<sup>114</sup> 〈第三高女 移轉 陳情 保護者有志 中瀨知事〉，《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2 月 20 日，07，第 11747 號。

<sup>115</sup> 〈臺北三高女將移轉 市民望照舊處 移壽小學校而擴張之〉，《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18 日，04，第 11502 號。

<sup>116</sup> 〈第三高女移轉問題 近 圓滿 解決 敷地 葬儀堂 約一萬坪〉，《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3 月 11 日，07，第 11465 號。

<sup>117</sup> 〈第三高女移轉問題 因無經費暫作罷論 一般謂靜修女昇格 稻艫生徒皆得利便〉，《台灣日日新報》，1933 年 6 月 24 日，n04，第 11931 號。

長高橋英一、呂阿昌。1934年3月三高女家長會長黃純青再度前往州廳，陳情希望建設三高女運動場及學校設備改善，官方回應當局亦認為有必要，務必努力完成此陳情案。<sup>118</sup> 11月17日，三高女家長會召開第一回總會，會員們約二百多名出席，會中多數會員提起日本關西風災，諸多學校校舍倒塌，若發生於臺灣，當如何防範？在熱切討論下，提出緊急動議，動議成立，推舉十二名實行委員，待總會結束後，於會議室再召開委員會。會中討論陳情方法，19日先派4名代表陳情。<sup>119</sup>

在臺北市民請願要求增設中學校的同時，1934年11月21日，台灣通信社社長田中一二與家長會長兼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的黃純青，與十名相關人士，針對臺北三高女校地狹小，校舍老舊問題，向野口敏治知事、福元岩吉內務部長陳情，希望三高女能夠遷校，陳情書內容如下：

反對在原校地進行校舍改建原因：

現位置改築反對的理由

一、本校現在位於花柳街等遊樂場所周圍，且附近以後將成為台北的淺草（商店街）的趨勢，對於女子教育的壞影響甚大。

二、現在位置的改築會與宿舍分離，如前所述由於在花柳界周圍，對寄宿生通學造成壞影響。

三、擁有二千餘名兒童的壽小學，時常運動場上兒童的喧鬧聲甚大，因此影響女學生的學習效率。

四、改築工事計畫花兩年進行，在工事進行期間也會妨礙女學生授業。

五、為免改築的不經濟，移轉郊外是最為經濟的，例如現在敷地一坪時價32圓，新校地位於郊外一坪8圓，等於以現在的一坪換得郊外的四坪。<sup>120</sup>

反對在原校地校舍改建的原因，除第五點經濟因素外，一到四點皆為了維持女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綜上述請願書內容，三高女遷校除因為女學生人身安全外，希冀更充足的空間與近代化設備（體育場），良好的學習環境，都是學生家長們要求遷校原因。

<sup>118</sup>〈三高女父兄會陳情擴張運動場〉，《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16日，08，第12094號。

<sup>119</sup>〈臺北三高女保護者總會 懲於關西校舍倒塌慘害 決議陳情州當局〉，《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9日，08，第12440號。

<sup>120</sup>〈歡樂鄉園 三高女 移轉 現位置改築 反對 代表者知事 訪問〉，《台灣新民報》，1935年11月22日。

## 校舍移轉理由

### 一、現在的校舍如危險的房屋不得安心

現在的校舍為木造，已經深受蟻害侵蝕成為危險房屋，萬一遇到災害必會出現很多犧牲者，不希望出現第二次關西的災害。（第三高女的學生六百多名與隔壁壽小學的兒童一千多名都無法避免不安）

### 二、校舍面積狹小，教育上不能期待了遺憾。

全島的高等女學校每一學生可使用的校地平均面積為 26 坪，而本校僅不過五坪多，作為現代教育的設備過於狹隘，自不待言。

### 三、沒有可稱為運動場之處，體育上的障礙很多。

在學校內沒有可稱為運動場之處，是女子體育獎勵上最遺憾的事。<sup>121</sup>

從陳情書內容可知，遷校原因有三，首先，舊校舍為木造，飽受蟻害侵蝕，1935 年關西遭遇颱風侵襲，日本許多學校倒塌並傷及師生，木造建築被視為危險的象徵。因此三高女的家長代表們認為舊校舍已無法安心學習；其次，校舍面積狹小，三高女學生可使用的平均空間不過五坪，遠低於全島高等女學校女學生分配的平均值；最後，沒有運動場也是現代教育與女子教育的一大阻礙。

此次陳情，野口知事表達豫算可能刪減，將無法移轉。<sup>122</sup> 11 月 23 日臺北州教育課派遣土木技手篠原武男調查，調查結果該校理科教室與家事教室等，均被白蟻侵蝕，危險至極。<sup>123</sup> 24 日早上 9 時，黃純青、田中一二、張阿漢、林佛國、謝汝詮、大久保源吾、黃逢時、藤田助四郎八名委員與郭廷俊一同拜訪福元岩吉內務部長與藤田淳教教育課長。<sup>124</sup> 並請市內州協議會員自願者與篠原技手再度前往三高女視察，結果州協議會員訪視後，莫不驚愕蟻害危害甚大，表達願協助遷校運動。<sup>125</sup> 三高女家長會再於 27 日召開緊急總會，討論善後對策，計畫寄附一萬圓作為遷校校地購買資金，並再與州當局交涉。<sup>126</sup> 30 日召開保護者會

<sup>121</sup> 〈歡樂鄉園 三高女 移轉 現位置改築 反對 代表者知事 訪問〉，《台灣新民報》，1935 年 11 月 22 日。

<sup>122</sup> 〈臺北第三高女移轉問題 豫算關係 絕望〉，《臺南新報》，1934 年 11 月 22 日，07，第 11809 號。

<sup>123</sup> 〈臺北第三高女改築移轉問題 篠原技師之調查與父兄之對策研究〉，《臺南新報》，1934 年 11 月 26 日，08，第 11813 號。

<sup>124</sup> 〈野口知事 陳情〉，《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39~41。

<sup>125</sup> 〈臺北州立三高女校 木造校舍蟻害危險 保護者有志連日講對策〉，《台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1 月 25 日，08，第 12446 號。

<sup>126</sup> 〈臺北第三高女校蟻害 保護者會協議對策 對於遷徙數地將寄附萬金〉，《臺南新報》，1934 年 11 月 26 日，n04，第 11814 號。

臨時評議員會，會中小野校長提及野口知事已同意撥款，由於遷校經費評估為 33 萬圓，州當局只能撥款 30 萬圓，不足經費須由保護者會籌款，因此保護者會通過成立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在募集到五萬圓的前提下，州當局同意通過三十萬圓豫算。<sup>127</sup> 募集金額與方式如下：

- 一、總額五萬圓。
- 二、三萬圓寄附於臺北州。
- 三、剩下二萬元作為起債利息及其他費用。如有盈餘，作為保護者會基金。
- 四、對現在保護者，募集一萬二千圓，一般關係或有志者，募集八千圓。其餘從未來入學生父兄或畢業生募集。
- 五、募集期間，昭和十、十一年度分攤。
- 六、寄附金一口至少五圓。<sup>128</sup>

隔年(1935年)2月25日三高女家長會所組改築助成會向全島名士募捐，包含本島人府評議員、各州協議會員，臺北州市協議會員，內臺人全部，與市內陳天來、蔡彬淮、黃金生、東京李延禧、福州林熊祥、周錫堯、廈門陳長福及東部諸士。<sup>129</sup> 6月22日州當局選定三高女遷校新址為朱厝崙一六七番地，新校地計一萬一千坪，教室為鋼筋混泥土三層樓，<sup>130</sup> 工程至1937年5月完工，<sup>131</sup> 7月8日遷校。<sup>132</sup>

## 二、支持三高女遷校的有力者

### (一) 陳情委員

支持私立國民中學設立者多為州市協議會員，多受過近代教育，職業上屬於新中間層。支持三高女遷校的有力者又是如何？支持三高女遷校的實行委員有黃純青、田中一二、張阿漢、林佛國、謝汝詮、大久保源吾、黃逢時、藤田助四郎

<sup>127</sup> 〈助成會 創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50~52。

<sup>128</sup> 〈三高女父兄有志 決議募金五萬圓 內三萬圓寄附于臺北州〉，《台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2 月 2 日，08，第 12453 號。

<sup>129</sup> 〈臺北三高女助成役員會 決定募捐〉，《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27 日，08，第 12539 號。

<sup>130</sup> 〈第三高女 移轉地決定 朱厝崙 一萬餘坪〉，《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6 月 22 日，n02，第 12653 號。

<sup>131</sup> 〈地三高女 殆 完成 移轉 七月 豫定〉，《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5 月 26 日，n02，第 13351 號。

<sup>132</sup> 〈臺北第三高女 移轉完了〉，《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7 月 8 日，07，第 13394 號。

與郭廷俊等。黃純青為家長會長，為樹林地區著名商人，林佛國畢業於師範學校，曾任教於深坑公學校，後進入《臺灣日日新報》工作，再擔任臺北州協議會員，謝汝詮（為謝汝銓之誤）為國語學校畢業，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曾為《風月報》主筆，1909年與洪以南等成立臺北第一大詩社瀛社，為日治時期臺北著名文人，曾任臺北州協議會員，主要關注教育議題，郭廷俊則為大稻埕方面活躍商人，與日人關係良好。又再從臺灣日日新報搜尋，可得知林佛國、謝汝兩人1927年12月參與臺北商業會，推測除記者工作外也有從事商業活動。<sup>133</sup>相較於國民中學請願者以日籍學務委員日籍州市協議員主導，具有高知名度。三高女遷校案由學生家長發起，陳情人士並非各個具有協議員身份，職業上多以商業為主，且以臺籍人士主導，日籍連署請願者較少。陳情人士依舊以新中間層佔多數。

表 4-4 三高女遷校陳情實行委員（1934 年）

姓名	生年	出身	學歷	來臺	職業(1934)	產業組合（1933）
黃純青	1875	臺北	漢學		臺灣總督府評議員、樹林信用合作社社長、樹德商行社長、桃園水利合作社評議員	
田中一二	1885	福岡	早稻田大學專門部	1917	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記者、臺灣通信社社長、臺北州會議員	
張阿漢						
林佛國			師範學校		臺北州協議會員（1923）、記者	臺北商業會
謝汝詮			國語學校		臺北州協議會員（1923）、記者	臺北商業會
大久保源吾						

<sup>133</sup> 〈臺北商業發起人會 舉委員定十八日 江山樓舉發會式〉，《台灣日日新報》，1927年12月12日，n04，第9925號。

黃逢時	1897	臺北	樹林公學校		樹德商行專務、海山輕鐵董事、臺北米穀卸商組合理事長	
藤田助四郎	1885	山口	高等小學校	1909	稻江信用組合常務理事	稻江信用組合
郭廷俊	1882	臺北	國語學校國語部		總督府評議會員、稻江信用組合長、臺灣米庫利用組合長	稻江信用組合、臺北庶民信用組合、永樂町店鋪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台灣米庫利用販賣購買組合

資料來源：《臺灣人士鑑》(1937年)

## (二)校舍改善助成會

三高女遷校擴校案共經歷兩次陳情，分別為 1932 年及 1934 年。1932 年的陳情委員，家長代表有：潁川增福、呂阿昌、劉克明、楊潤波、張阿漢，此外非家長代表但對於此問題的立場相同而列名的有：范亞丕、張清港、陳天來、陳茂通、陳其春、郭廷俊、辜顯榮、黃玉對、蔡彬淮、許智貴、魏清德。<sup>134</sup> 筆者再以 1933 年《臺北州下產業組合役職員錄》對照，發現陳情委員中隸屬稻江信用組合者有：郭廷俊、張清港、陳天來、陳茂通、楊漢龍、許智貴，隸屬於艋舺信用組合有：魏清德、范亞丕、蔡彬淮、呂阿昌；黃玉對為萬華信用利用組合理事。<sup>135</sup> 筆者在此將上述臺籍陳情委員分為大稻埕派與艋舺派，稻江信用組合為大稻埕派，艋舺信用組合與萬華信用利用組合為艋舺派。1932 年的陳情失敗，除了官方經費不足，家長代表中呂阿昌與劉克明只同意連名，並未真正支持與行動，家長代表們彼此並不協同一致。若以參與組合區分為大稻埕派與艋舺派，或可解釋家長代表們基於所屬人脈網絡的不同，對於校地選定有不同意見，無法目標一致。

請願失敗後，張阿漢、李瑞生與簡敦棹等人開始倡導創立保護者會<sup>136</sup>。1933

<sup>134</sup> 〈一大挫頓—中瀨知事的來任 計畫變更〉，《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18。

<sup>135</sup> 《臺北州下產業組合役職員錄》，頁 4-8、24，台灣產業組合協會臺北州支會，1933 年。

<sup>136</sup> 〈一大挫頓—中瀨知事的來任 計畫變更〉，《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18。

年 7 月 9 日召開第一回保證人會，參加人數 526 人<sup>137</sup>，會中多數家長對於學校教育展現莫大熱誠，因此九月時有志者發起成立家長會，並且幾乎全部父兄大力贊同，在 9 月 27 日召開發起人會議制定會則，得到州當局同意，10 月 14 日再審議會則與商量典禮事宜，10 月 7 日正式成立保護者總會與舉行典禮，出席者 237 名<sup>138</sup>。1934 年家長會召開第二回總會時，遷校案成立後，選出移轉助成會會員（附錄一），這次的助成會會員們，區域上散布臺北各區，除人數上暴增，日籍人士也增多，雖然這些人士雖不到人士鑑收錄程度，但例如呂阿昌、魏清德屬於艋舺信用組合職員，藤田助四郎、黃鋌、李瑞生等人為稻江信用組合職員，謝汝詮、林佛國過去為臺北州協議會員，可推測助成會會員多少在該地域具有某些資產，甚至是人望或社會地位。

最後在經費募集方面，募集寄附金五萬圓金額頗大，開始募集寄附金後，初期成效不佳，改善助成會召開會議經多次討論後，鑑於募集狀況不佳，最終決議會員至少每人繳交二十圓寄附金，並以學友區為基礎，由該區的地方委員、幹事、評議員協力勸募，每位學生家長至少勸募二十圓，由助成會會員率先開始，再擴及家長會全體，最後才是全校師生與校友。<sup>139</sup> 實際捐款者與金額，部分載於報上：寄附百圓以上者，撮之如左。

黃純青千圓。

張清港、陳逸松、陳海沙，各五百圓。

陳天來、李延榮，各三百圓。

陳茂通二百圓。

楊漢龍、黃有土、張山鐘各一百五十圓。

田中一二、藤田助四郎、高橋英一、蔡金柳、洪圖、陳增全、林石泰、吳培銓、陳氏賢、呂阿昌、蘇清洪、林振聲、連式奎、陳天柱、羅福元、林捷龍、林嘉普、陳振光、范增壇、王生、李瑞生、陳寶興各一百圓。

其他百圓以下，約一百五十人。

合計一萬五千圓，意外好成績。<sup>140</sup>

其後家長與有志者依舊相當踴躍捐款。<sup>141</sup> 最終募得五萬圓，順利遷校。

<sup>137</sup> 第一保證人 355 人，代理人 210 人，缺席者 39 人，故出席 526 人。《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 46，1933 年。

<sup>138</sup>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三十五周年記念誌》，頁 47。

<sup>139</sup> 〈新敷地 決定〉，《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96~97，。

<sup>140</sup> 〈三高女寄附金一萬五千圓 極好成績〉，《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 5 月 16 日，n04，第 12979 號。



### 三、女子教育的擴張

#### (一) 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

前述日台籍有力人士提出的教育要求，最終州當局同意遷校，並撥款 30 萬圓。新校地最終決定為上埤頭一四〇、一七〇番地，朱厝崙一六四、一六七、一六八番地，面積為一萬一千坪。新校地面積廣大，且依據台北市區計畫圖，將來會位在大臺北市中央，比起大稻埕的建成町，經由大正町四 通到松山的最近道路，位在台灣神社與水道町的大公園的交叉處，可以想見將來是相當重要的地區，且雖然附近還是水田，未來將規劃為內地人住宅區……交通方面徒步二町即有鐵路，市公車，基隆線公車，然而大正町四 通道路尚未開通，萬華、新店地區通學較不便，只能徒步通學。<sup>142</sup> 簡言之，在未來的都市計劃下，三高女移轉的新校地，位於都市中心，鄰近神社與公園，附近為內地人住宅區，環境清幽適合學習，對於臺北州學生，除萬華、新店地區須徒步上學外，交通便利。

遷校後，1939 年三高女增加一班，當年入學志願者也暴增。由於中等學校志願者年年增加，錄取名額並未增加，以臺籍女學生為主的三高女，本島人錄取率反而下降。

表 4-5 第三高女入學志願者、入學者數 單位：人

	入學志願者		入學者數		錄取率(%)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36	56	361	12	143	21.4	39.6
1937	84	466	37	167	44.0	35.8
1938	84	466	37	167	44.0	35.8
1939	303	747	47	212	15.5	28.3
1940	48	697	12	195	25	27.98
1941	42	815	13	192	30.95	23.55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1936 至 1941 年

<sup>141</sup> 〈三高女寄附金 陸續申 意外踴躍〉，《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 5 月 21 日，n04，第 12984 號。

<sup>142</sup> 〈新敷地 決定〉，《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90。

## （二）市立家政女學校

家政女學校設立陳情最早見於 1935 年 12 月 20 日的日日新報。<sup>143</sup> 1936 年臺北市新設臺北第二商業學校，以緩和入學難。<sup>144</sup> 當時也討論到設立家政女學校以緩和入學難：臺北市教育課數年前計畫創立家政女學校。因財政關係，延至十二年度。……來四月十五日開校。此三年制實科女學校實現，得幾分緩和市內入學難。<sup>145</sup> 為了緩和入學難，1937 年臺北市政府設立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

市立家政女學校雖為實業補習教育，但根據 1937 年公布的臺北家政女學校學則，其上課內容為：授予女子家事裁縫及技藝相關必要的知識技能，並施以國民生活必要的教育以涵養婦德為目的。教學科目為：修身公民科、國語、數學、家事、國史、裁縫手藝、圖畫、音樂、體操及選修花道、茶道、園藝。第一學年授課時數 33 節，裁縫手藝佔 15 節，接下來為國語 4 節，家事、體操各 3 節；第二學年 35 節，家事增加為 4 節，其餘科目時數照舊；第三學年 35 節，家事再增加為 6 節，沒有圖畫課，其餘依舊。<sup>146</sup> 對於此授課內容，時人評為與其說是實科學校，不如說是具有新娘學校的性質，以培養畢業後成為家庭主婦為目的。<sup>147</sup>

儘管如此，臺北家政女學校設立，募集學生消息公布後，短短五日內，入學申請書印刷本五百枚被人索盡，<sup>148</sup> 入學名額一百名，應募者多至三百餘名，<sup>149</sup> 可見受歡迎程度。從表 4-3-1 實際志願者數與入學者數來看，臺北家政女學校設立後，內地人志願者數為本島人的五倍，志願者數多為日籍女學生，或許是因入學考試上，考查科目及程度以尋常小學校畢業程度為準，並加上面試，不利於台灣人之故。<sup>150</sup> 此點或可反應在臺籍學生志願者數上，當時學生深知入學考試不利

<sup>143</sup> 〈商工專修學校 新設 度 家政女學校 欲 谷口氏 希望開陳〉，《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2 月 20 日，02，第 12833 號。

<sup>144</sup> 〈台灣實業校規則改正 得開設夜間實業學校 希望設立藉以緩和入學難〉，《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7 月 5 日，n04，第 12666 號。

<sup>145</sup> 〈臺北市立家政女校 按四月十五日開校 募第一學年生徒百名〉，《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9 日，08，第 13274 號。

<sup>146</sup> 臺北市役所，〈臺北家政女學校學則〉，《臺北市報》，第 538 號，1937 年 3 月 20 日，頁 35。

<sup>147</sup> 榎本美由紀，〈日治時期台灣家政教育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0，頁 9。

<sup>148</sup> 〈台北市家政女學校 大受歡迎競行志願 校長候補千葉後藤兩氏〉，《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24 日，n04，第 13289 號。

<sup>149</sup> 〈家政女學校 入學難 三人 一人 割合 合格 入學試驗 十、十一 兩日〉，《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4 月 7 日，n02，第 13302 號。

<sup>150</sup> 臺北家政女學校生徒募集要項：

四、考查科目及程度

(一) 入學志願者超過募集者數，進行身體檢查、體力檢查、口頭試問及筆答考試。

(二) 入學考試依照尋常小學校畢業程度

於自己，自然志願者數也少。因此雖為了解決中學校升學困難問題，實際上臺北家政女學校入學者多為日籍學生，反倒解決日籍學生的升學難現象。

表 4-6 家政女學校入學志願者及許可數

	臺北家政女學校			
	志願者數		許可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1939	363	69	156	12
1940	490	51	225	6
1941	481	76	198	20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書》，昭和 14 年，頁 43，昭和 15 年，頁 43，昭和 16 年，頁 45，臺北市役所。

本節試圖透過國民中學設立與臺北第三高女遷校，明瞭臺北地區民眾如何爭取更多教育資源。並以新舊中間層的基準，釐清這些支持基盤的背景。發現不論日台籍支持人士，以新中間層職業人士佔多數，分析這些民間人士的參與過程，這些民間人士最初為學務委員或家長會長，他們自發組織委員會，請願陳情，在這過程中透過市協議會、州協議會、府評議會，甚至產業組合網絡拉攏更多有力人士加入請願，不斷與官方協商，最終官方有條件地同意設校、遷校，要求這些有力者準備為數不小的資金，建校前的自籌款，更是透過家長會或有力者的人脈網絡籌措募集。

由民眾自發請願設校，籌措財源，創立學校的過程，相當類似日治初期公學校經費籌措過程。相較於藤井康子提出 1920 年代高雄州、臺南州、臺南州嘉義街各地域爭取設立中學校作為地域振興的方法。1930 年代臺北地區則是因為入學難深刻化，促使日臺籍中間層正視此問題，努力為子女要求更多的教育資源。儘管分屬不同民族（日、臺籍）、勢力範圍（大稻埕、艋舺、臺北城內）、職業（醫師、律師、記者、商店主），由於臺北各地域有力者的目標一致，得以成功爭取更多教育資源。

(三) 筆試科目為國語、國史及算術

(四) 口試問題為關於國民精神與德性的事項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第 538 號，1937 年 3 月 20 日，頁 39。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想要處理的問題是，究竟 1920 年代後臺北市的初、中等教育狀況如何？從官方－地方社會－民眾的面相觀察臺北這一地域的教育發展，除了究明臺北這區域教育發展的過程，也希望能嘗試解釋 1930 年代就學難時空背景下，學童何以選擇「升學」，「升學」的意義為何？並建構地方社會的民眾如何爭取增班設校？怎麼爭取成功的過程。本文的結論有以下三點：

### 一、臺北市初中等教育發展

日治時期臺北作為政治、經濟中心，人口數、日人居住比例、產業型態（官公吏、商業）、市政發展皆優於全島其他都市。在這些背景因素下，此地區每年投入相當比率的經費於初等教育事業，從就學率與就學人口、畢業人口來看臺北地區的初等教育，成效可說相當驚人。然而中等教育部分，在官方的教育政策主導下，成長空間相當小。這在過去的研究已明確指出，中等以上學校日台人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確不論是中學校、工業學校、高等女學校這些學校，報考的台籍學生數倍於錄取者，儘管如此難考，1930 年代後每年報考者仍增加，可見臺北地區已形成升學風潮。本文開頭引用田中一二以「向學心的勃興」誇耀臺北初等教育事業成績，反過來說，就是因為初等教育的勃興，上級升學機關無法配合增設，才導致就學難現象深刻化。從台北地區的二中及三高女入學學生籍貫也可知 1930 年代臺北市的中學校跨區就讀情形並不高，多數的台籍學生主要升學私立學校或公學校高等科，其中公學校畢業的女性逐年增加，畢業後就業比率於 1939 年後超過半數，可以說是新式教育帶動價值觀的改變，女子從家庭釋出投入職場。此外臺北地區作為工商產業為主的都市，1930 年代增設的中等學校有臺北三中、臺北第二商業學校、臺北商工專修學校，相當符合區域特色。

### 二、「升學」的意義

不論男女，能否升學首要考量經濟因素，從國家教育政策角度，官方依據統治政策期望臺籍學生成為工商業技術人才，然而對於學生而言，選擇「升學」更多是現實的考量，不論是受父母期許或師長影響，甚至是敏銳地意識到某個職業的前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學童對於升學的自我意識。只要是升學，對於家庭都是一筆開銷，在經濟考量、家族戰略等因素下，女子通常比男子不易升學，也

因此從口訪回憶錄中可看到女子期望升學的心態。根據筆者蒐集的口訪回憶錄等，男子雖較少顯露出強烈升學的期望，然而考入二中及台北工業學校的學生，半數以上為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或高等科一年級修畢。以現在觀點來說等同於非應屆考上，當時的男學童承受數次落榜，也要再考一次的行為，或可反應男子對於升學的期待。因此不論男女，不論受父母或師長影響，對於升學，可說相當重視。

### 三、實證民眾對於教育的主動性

1930年代由於供需失衡，升學異常競爭，學生家長們也因此要求官方增班、增設學校。進而有私立國民中學的設立申請與三高女遷校擴校的兩大教育訴求，這兩項請願運動，由學務委員或家長會長等民間人士發起。以私立國民中學設立為例，由日籍的學務委員或家長會長發起，組織委員會，他們多具有協議員身分，便拉攏其餘協議會員的支持，或是透過產業組合管道，尋求臺籍協議會員或有力者的加入。在設校經費，日籍主事者更向大稻埕、萬華方面有力人士尋求募款。

臺北三高女遷校擴校，也由家長方面發起陳情，陳情委員以臺籍人士為主，也是爭取日臺籍協議會員的支持，不斷請願陳情。其後組成的遷校擴校助成會，共計會員74名，這些會員雖不到人士鑑收錄程度，但依照筆者對於三高女家長資產的統計，這些參與者應資產頗豐，在地方上具有某些人望或社會地位，如此多的地方有力者請願奔走，官方無法輕忽最終同意撥款遷校，同樣在遷校經費上，採取募款方式，由助成會會員率先開始，再擴及家長會全體，最後才是全校師生與校友。

教育作為貫徹統治政策的手段，日治時期臺灣自是無法脫離殖民統治框架，日治時期統治者施行的教育政策，自有其意圖與預期達到的目的，然而殖民地人民並非全盤接受，甚至起而爭取。1930年代由於入學難現象的深刻化，促使日台籍有力人士發起各項教育擴張運動，透過市協議會、州協議會、府評議會，甚至產業組合網絡聯繫，組織委員會、助成會，部分人士運用協議員身分陳情請願，同時尋求更多有力者的支持。儘管這屬於教育問題，然而分屬不同民族、地域、職業別的臺北地區有力人士，積極主動地聯絡組織，由於臺北各地域有力者對於教育議題的重視，得以成功爭取更多教育資源，同時也應證都市的中學校因為有新中間層的支持，得以穩固發展，且較能發揮其教育機能。

## 附錄

附錄一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役員

職稱	名字	職稱	名字	職稱	名字
顧問	小野正雄	幹事	小川	評議員	陳茂通
顧問	西村寬司	幹事	嬉野悌興	評議員	謝汝詮
顧問	上原景爾	幹事	平川豐	評議員	陳紹裘
會長	黃純青	幹事	潘耀輝	評議員	邱木
副會長	田中一二	幹事	李宗銘	評議員	高橋英一
副會長	呂阿昌	幹事	潘綿堂	評議員	中市藏
常任幹事	永谷忠	幹事	井口靜夫	評議員	黃逢時
常任幹事	藤田助四郎	幹事	寺本十太郎	評議員	遠山巖
常任幹事	劉克明	幹事	張阿漢	評議員	林佛國
常任幹事	簡敦棹	幹事	岩佐塚藏	評議員	吳朝瑞
常任幹事	李瑞生	幹事	郭拔海	評議員	王祖派
常任幹事	謝龍何	評議員	李添盛	評議員	陳增全
幹事	鄉原藤一郎	評議員	魏清德	評議員	大久保源 吾
評議員	朱阿西	評議員 (永樂南區)	張圳德	評議員(臺北 州下一員)	林捷龍
評議員	林溪	評議員(永 樂北區)	高天成	評議員(新竹 州下一員)	徐欽喜
評議員	黃	評議員(新 起區)	多賀萬壽	評議員(台中 州下一員)	張慶章
評議員	李根盛	評議員(八 甲區)	三原寶映	評議員(台南 州下一員)	林振聲
評議員	李朝芳	評議員(有 明區)	林天河	評議員(高雄 州下一員)	蘇嘉邦
地方委員 (宮前區)	林有土	評議員(南 門區)	高橋長藏	評議員(東部 一員)	陳振宗
地方委員(下 奎府兩區)	林濟川	評議員(東 門區)	平井莊次郎	評議員(福州 廈門一員)	洪禮修
地方委員(大 正區)	吉牟田俊彥	評議員(古 亭區)	齋藤利司	評議員(會計 主任)	平野健人

地方委員 (太平南區)	張東青	評議員(板 橋區)	林長存	評議員(庶務 主任)	三隅三世 吉
地方委員(太 平中區)	蕭柄堯	評議員(桃 園區)	王春茂	評議員(會計 係)	島昇
地方委員(太 平北區)	陳郁文	評議員(士 林區)	林振聲	評議員(庶務 係)	宮內八郎
地方委員(大 橋區)	陳慶福	評議員(淡 水區)	吳傳宗		

資料來源：《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頁 58，1938 年。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與官方檔案

#### (一) 官方檔案、統計書

《臺灣總督府府報》(1896年8月20日至1942年3月31日)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903~1937年)

《臺灣總督府學事法規》(1896~1902年)

《臺北市統計書》(1931~1940年)

《臺灣學事一覽》(1923~1934年)

《臺北州學事一覽》(1926、1932、1935、1941年)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北市報》

#### (二) 學校檔案、沿革誌

《臺灣教育沿革誌》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一覽》(1933~1941年)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1927~1936、1939、1940年)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一覽》(1926、1938~1943年)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1940年)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一覽》(1938年)

《私立臺北中學校一覽》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一覽》(1920)

《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工學校一覽》(1929、1931、1937)

《臺灣商工學校創立十五週年紀念號》

《臺灣商工學校創立二十週年紀念號》

#### (三) 報紙雜誌、其他

《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教育會雜誌》



《臺北市史》

《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臺北市政二十年史》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

## 二、中文專書

王詩琅，《臺北市志》，卷八，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8年。

竹中信子，曾淑卿、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明治篇、大正篇、昭和篇），2007年

朱珮琪，《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臺北：遠足文化，2004年。

李鎧揚，《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臺北：國史館，2012年。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台灣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2010年

## 三、回憶錄資料

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

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2007年。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蔡說麗紀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放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鄭麗玲、楊麗祝，《臺北工業生的回憶》，臺北：台北科大，2009年。

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年。

#### 四、期刊論文

王榮，〈日本統治時代台灣職業補習學校〉，《東洋史訪》，（神戸；兵庫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2001），頁 23-35。

吳文星，〈日治前期台灣職業教育之建立與資源之開發〉，《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榎本美由紀，〈日治時期台灣家政教育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0，（2000 年 7 月），頁 7-16。

#### 五、學位論文(依姓名筆畫)

朱珮琪，〈日治時期精英教育的搖籃—以臺中一中為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研究（1905-2003）〉，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1895-1945）〉，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金柏全，〈日治時期台灣實業教育之變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台北都市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年。

鍾育姍，〈《臺灣民報》有關教育言論之研究(1920-1932)〉，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年。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方針、制度、背後支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藤井康子，〈1920 年代中等高等教育地域社〉，京都大學教育研究科教育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11 年。